

## 東漢至三國武陵郡的屯戍體系與武陵蠻

王 萬 雋\*

### 摘 要

本文企圖通過近年出土的東漢與三國簡牘，配合傳世地理書，重建武陵蠻與東漢政權之間軍事衝突的路線，以及戰後延續至三國時代的屯戍體系概況。據本文考察，建武年間兩者的衝突集中在沅水的五溪地區和沅水下游，其次則是澧水流域。東漢政府為了在戰時與戰後抵禦和統治武陵蠻，沿著這兩個流域興建各種大小的屯戍與城池，建立起相當規模的屯戍體系。屯戍當中的人員，也從郡外的軍隊轉變成負擔日常力役的郡縣民，並有許多善蠻被招募。甚至於孫吳政權時，強制將蠻人編入軍中參與伐蠻戰爭。於此同時，孫吳政權在繼承東漢屯戍的佈署之外，還針對沅水與澧水流域在行政區劃上進行劃分，影響日後王朝統治湘西地區蠻人的基本格局。

關鍵詞：武陵郡、武陵蠻、屯戍體系、東漢、孫吳、城池

---

\* 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副教授。

## **The Military Defense System and the Wuling Barbarians in Wuling Prefecture from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to the Three Kingdoms**

Wang, Wan-chun\*

### **Abstract**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rebuild the military conflict route between the Wuling barbarians (武陵蠻) and the Eastern Han government as well as the military defense system in Wuling Prefecture (武陵) by utilizing bamboo manuscripts and local histories from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to the Three kingdoms. According to this research, the main military conflict zone between the Wuling barbarians and the Eastern Han government was in the basin of the Yuan River (沅水), and the area next in importance was the basin of the Li River (澧水) during the reign of the Jianwu Emperor (建武). Along the two rivers, the Eastern Han government built many fortresses and castles in order to defend themselves against and rule over the Wuling barbarians during wartime and in the postwar era. In this system of military defense, soldiers came from outside the prefecture at wartime later became local residents. At the same time, the Wuling barbarians were recruited into the army by the Eastern Han government and Sun Wu government. The Sun Wu government inherited the military defence pattern of the Eastern Han Government, and furthermore, conducted administrative district reforms in the Li River and Yuan River areas, which left an impact on the ruling patterns of future dynasties over the Wuling barbarians.

**Keywords: Wuling Prefecture, military defense system, Wuling barbarians, Eastern Han dynasty, Sun-Wu dynasty, Castle**

---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 壹、前言

東漢至三國時期，長江中游一帶蠻人與政府之間的衝突是個相當顯著的現象，《後漢書》和《三國志》對此情況多有記載。自二十世紀以來，學者對於蠻人叛亂的時間、地區與原因，以及政府的處置方式等，皆進行一定程度的討論與資料整理。然受限於文獻記載的簡略，相關研究至二十世紀末便遭遇了瓶頸，難有突破。<sup>1</sup> 然近十餘年以來，隨著東漢與三國簡牘的發現與利用，都成為重新理解東漢至三國時期蠻人與政府之間關係的突破口。

較早被發現且目前仍不斷陸續整理出的長沙吳簡中，出現了大量臨湘縣人民的姓名，有學者就透過姓氏討論長沙當地的族群問題。<sup>2</sup> 此外，吳簡中也存在著「夷兵」、「夷民」和「生口」的記載，促使學者討論吳國初期對於境內蠻人的統治情況，以及相關蠻人的身分問題，而這又與嘉禾年間吳國討伐武陵蠻的戰役建立起關聯。<sup>3</sup> 至於東漢簡牘方面，東牌樓漢簡、張家界古人堤與長沙五一廣場簡牘的訊息，則激起學者關注於東漢時期蠻人存在的實況，<sup>4</sup> 和東漢政府伐蠻軍隊的屯戍與軍糧運送等

<sup>1</sup> 中文學界如張雄，〈漢魏以來「武陵五溪蠻」的活動地域及民族成分考述〉，《中南民族學院學報》，第1期（1985），頁25-34；王瑞蓮，〈試論武陵、五溪的區別及五溪蠻的分布〉，《中南民族學院學報》第5期（1989），頁44-47。此外可參看斷代史的著作，包括田繼周，〈秦漢民族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第7章〈巴郡、南郡、武陵諸郡蠻和西南夷〉，頁398-466。日本學界方面可參見谷口房男，〈後漢時代的武陵蠻〉、〈三國時代的武陵蠻〉，均收入氏著，《華南民族史研究》（東京：綠蔭書房，1997），頁11-31、33-56。

<sup>2</sup> 如滿田剛，〈長沙走馬樓吏民田家籍に見える姓について〉，《嘉禾吏民田家籍研究——長沙吳簡研究報告》，第1集（2001），頁80-95。魏斌，〈吳簡釋姓——早期長沙編戶與族群問題〉，《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24期（2008），頁23-45。

<sup>3</sup> 關於「夷兵」和「夷民」的討論，可見王素，〈說「夷民」——讀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劄記〉，《故宮博物院院刊》，第5期（2004），頁49-52，後收入其著《漢唐歷史與出土文獻》（北京：故宮出版社，2011），頁176-179；羅新，〈王化與山險——中古早期南方諸蠻歷史命運之概觀〉附論「吳簡中的『部伍夷民』問題」，《歷史研究》，第2期（2009），頁16-20；後收入《王化與山險：中古邊裔論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9），頁3-28。熊曲，〈也說吳簡夷民問題〉，《簡帛研究》，2015春夏卷（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頁229-236。至於「生口」方面的討論，可見李鄂權、駱黃海，〈從長沙走馬樓吳簡看孫吳時期長沙郡的人口流動和民族融合〉，《福建文博》，第4期（2003），頁35-41；李均明、宋少華，〈《長沙走馬樓吳簡》竹簡〔肆〕內容解析八則〉，收入中國文物研究所編，《出土文獻研究》，第8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頁182-195；熊曲，〈論長沙走馬樓吳簡中「生口」及相關問題〉，收入中國文化遺產研究所編，《出土文獻研究》，第12輯（上海：中西書局，2013），頁327-339；凌文超，〈走馬樓吳簡中所見的生口買賣——兼談魏晉封建論之奴客相混〉，《史學集刊》，第4期（2014），頁73-81；沈剛，〈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所見「生口」買賣問題補論〉，《煙台大學學報》，第29卷第2期（2016），頁89-93。

<sup>4</sup> 王萬雋，〈漢末三國長沙族群關係與大姓研究之一——漢末部分〉，《早期中國史研究》，第2卷第1期（2010），頁43-86。

問題。<sup>5</sup>

在這之中，魏斌〈古人堤簡牘與東漢武陵蠻〉一文相當值得重視。此文從張家界古人堤簡牘所提供的訊息切入，探討東漢時期武陵郡的控禦體系，對於重新理解東漢政府統治武陵蠻的方式，以及對武陵蠻在當時造成的影響方面皆有很大的推進。在史料方面，此文除了運用簡牘之外，也大量使用石刻文字和出土印章等。雖然這些資料僅能夠提供片段的訊息，許多問題未能完全解決，但研究取徑與史料的運用可說相當值得採借。<sup>6</sup> 此外，周宏偉透過考古發現與地理書的記載，從歷史地理的角度交叉比對復原秦漢魏晉時期武陵郡縣治與山川的作法，同樣提供值得借重的研究方法。<sup>7</sup> 本文將以這些研究作為基礎，既利用近年被整理出版的出土資料，也重新尋找傳統文獻史料中過往被忽視的細節，尤其是傳世地理書的記載。希望從地理空間的角度，重新討論從東漢時期至三國時期，武陵蠻的反政府活動、政府討伐蠻人的路線與屯戍體系的建立等問題，<sup>8</sup>以期重新認識當時蠻人與政府之間複雜的關係。

## 貳、馬援的最終戰役：蠻人起事地點與東漢軍隊討伐路線

東漢長沙武陵蠻的反政府運動，幾乎與東漢王朝相始終。根據《後漢書·南蠻傳》的記載，在東漢桓帝永壽三年（157）以前，蠻人起事的主體為武陵蠻，且幾乎集中在武陵郡北部的澧水、澧水流域，當地的蠻人又多被稱為「澧中蠻」和「澧中

<sup>5</sup> 古人堤簡牘雖發現於 1987 年，但殘破嚴重。直到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國文物研究所後利用紅外線儀器，於 2003 年才公佈釋文。見張春龍、李均明、胡平生〈湖南張家界古人堤簡牘釋文與簡注〉，《中國歷史文物》，第 1 期（2003），頁 72-84。本文以下所徵引古人堤簡牘釋文及其編號，皆出自此文，不再作注。又可參考魏斌，〈古人堤簡牘與東漢武陵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85 本第 1 分（2014），頁 61-103。之後學者則在此基礎下，利用長沙五一廣場簡牘討論軍糧運送的相關問題，分見劉國忠，〈長沙東漢簡所見王皮案件發微〉，《齊魯學刊》，第 4 期（2013），頁 41-43；劉樂賢，〈長沙五一廣場出土東漢王皮木牘考述〉，《中山大學學報》，第 3 期（2015），頁 52-61；劉國忠，〈五一廣場東漢簡王皮運送軍糧案續論〉，《出土文獻》，第 7 輯（2015），頁 250-253。

<sup>6</sup> 魏斌，〈古人堤簡牘與東漢武陵蠻〉，頁 61-103。

<sup>7</sup> 周宏偉，〈湘西里耶盆地諸古城遺址的歷史身分〉、〈「五谿」本義考〉，皆收入《古代西南地理問題新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8），頁 242-256、257-269。其中〈湘西里耶盆地諸古城遺址的歷史身分〉原刊於《湖南省博物館館刊》，第 7 輯（2010）。

<sup>8</sup> 在魏斌之前，伍新福在《湖南民族關係史》的第二章中，特闢一小節討論漢晉之間王朝對於湖南蠻族的武力征討、軍事鎮戍和郡縣建置。此文論點大致可從，然討論過於簡略，仍有許多值得進一步申論之處。見伍新福，《湖南民族關係史》（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第 2 章〈秦漢至南北朝時其湖南民族與民族關係〉的第三節之一，頁 118-125。

蠻」。在多次的蠻人起事中，以光武帝建武二十三年（47）至二十五年（49）的這場衝突最為嚴重。

然而對這場蠻人起事爆發的地點，以及之後東漢政府軍進軍的目標，學者之間的看法存在著巨大差異。有些學者認為是在沅水中上游的五溪地區，亦有學者認為是在澧水流域的充縣。<sup>9</sup> 最近，魏斌根據張家界古人堤簡牘，贊成這場戰爭主要以澧水流域充縣為中心的論點。並進一步認為，在這場戰爭之後至東漢中期，東漢政府於澧水和澧水流域週遭，建立起長期存在的軍隊控禦體系。<sup>10</sup> 然而，建武二十三年至二十五年的這場武陵蠻與東漢政府的衝突，不僅發生在澧水和澧水流域，充縣亦未必為這場戰爭的核心區。以下便結合傳世文獻與出土資料，重新討論東漢初年武陵蠻起事和東漢政府軍征討、屯戍與築城防禦的相關地理位置。

建武二十三年（47）這場武陵蠻人起事的地點與蠻人的身分，文獻中至少有三種不同類型的稱法：（1）以郡稱：武陵蠻；（2）以河流流域稱：武陵五溪蠻或五溪蠻；（3）單一河流稱：武溪（谿）蠻。因為五溪或武溪皆在武陵郡的沅水流域，故不同的稱法似乎可視為描述上的精確程度的差異，但仔細考察後，又並非如此簡單。

武陵蠻的記載可見《後漢書·光武帝紀》，此事被繫於當年十二月，「十二月，武陵蠻叛，寇掠郡縣，遣劉尚（？-47）討之，戰於沅水，尚軍敗歿。」<sup>11</sup>《後漢書·南蠻傳》則提及為首者姓名：「光武中興，武陵蠻夷特盛。建武二十三年，精夫相單程等據其險隘，大寇郡縣。」<sup>12</sup>「精夫」為蠻人渠帥之義，可知是以蠻酋相單程為首。然而「武陵蠻」的稱法無法說明更為精確的地點，故以下根據漢朝軍隊的進軍路線，重新推估這場戰爭爆發的可能地點與戰場位置。

首先，〈光武帝紀〉提到東漢派遣的劉尚與武陵蠻「戰於沅水」，在〈南蠻傳〉

<sup>9</sup> 認為五溪者有瞿湘周，〈劉尚馬援五溪征蠻之地小考〉，《中南民族學院學報》，第5期（1988），頁47-48。以及上述伍新福，《湖南民族關係史》，第二章，〈秦漢至南北朝時其湖南民族與民族關係〉的第三節之一，頁118-125。周宏偉，〈「五谿」本義考〉，頁257-269。認為充縣者則有張雄，〈漢魏以來「武陵五溪蠻」的活動地域及民族成分考述〉，頁25-34。此外尚有羅維慶、羅中，〈馬革裹屍何處還——馬援征武陵蠻歿地新考〉，《中央民族大學學報》，第3期（2010），頁80-86。

<sup>10</sup> 魏斌，〈古人堤簡牘與東漢武陵蠻〉，頁61-103。

<sup>11</sup>（南朝宋）范曄，《後漢書》，卷1下，〈光武帝紀〉，頁75。

<sup>12</sup>（南朝宋）范曄，《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81），卷86，〈南蠻西南夷列傳〉，頁2831。

中的記載更為清楚，提及「武谿」：

遣武威將軍劉尚發南郡、長沙、武陵兵萬餘人，乘船泝沅水入武谿擊之。尚輕敵入險，山深水疾，舟船不得上。蠻氏知尚糧少入遠，又不曉道徑，遂屯聚守險。尚食盡引還，蠻緣路邀戰，尚軍大敗，悉為所沒。<sup>13</sup>

此處提到武威將軍劉尚率領軍隊從沅水溯源而上，進入武谿攻擊蠻人。但在蠻人據有地利之下，劉尚軍久困糧盡，並在退軍的時候沿路被蠻人襲擊，因此戰死大敗。由此可知建武二十三年這場戰役發生地點當在沅水中游，而蠻人的勢力則應來自於武谿。另外，根據《輿地紀勝》的記載，為討伐蠻人，劉尚曾在沅陵縣築城：「劉尚故城，在沅陵縣西南一百二十里。今城雖廢，亦控扼蠻獠之地。」<sup>14</sup> 故至少劉尚伐蠻的戰役，曾深入到沅水中游的沅陵縣一帶。又據《水經注》的記載：「〔沅〕水又逕沅陵縣西，有武溪，源出武山，與西陽分山，水源石上有盤瓠跡猶存矣。」<sup>15</sup> 則可知武溪注入沅水處即為漢代的沅陵縣城。劉尚軍沿沅水上泝，在當地選擇了地勢險要之處築城防禦蠻人，儘管後來兵敗沅水。且劉尚軍因「舟船不得上」和「不曉道徑」，以及蠻人「屯聚守險」，使得劉尚軍進軍似僅於此處。

劉尚軍大敗後，其率領的南郡、長沙、武陵等諸郡兵萬餘人似乎一路潰敗。建武二十四年（48）七月，相單程便順著沅水而下，進攻下游的臨沅城。東漢政府於是再派遣謁者李嵩（生卒年不詳）、中山太守馬成（？-56）、劉尚進軍，卻仍不能擊退蠻人勢力。此時，名將馬援（前 14-49）請纓出馬率軍征討武陵蠻。《後漢書·馬援傳》提到：

〔建武〕二十四年，武威將軍劉尚擊武陵五溪蠻夷，深入，軍沒，援因復請行。……遂遣援率中郎將馬武、耿舒、劉匡、孫永等，將十二郡募士及弛刑四萬餘人征五溪。明年春，軍至臨鄉，遇賊攻縣，援迎擊，破之，斬獲二千餘人，皆散走入竹林中。<sup>16</sup>

<sup>13</sup> （南朝宋）范曄，《後漢書》，卷 86，〈南蠻西南夷列傳〉，頁 2832。

<sup>14</sup> （宋）王象之撰，李先勇點校，《輿地紀勝》（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5），卷 75，〈辰州〉，頁 2650。

<sup>15</sup> （北魏）酈道元著，楊守敬、熊會貞疏，段熙仲點校，陳橋譯復校，《水經注疏》（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1989），卷 37，〈沅水〉，頁 3080。

<sup>16</sup> （南朝宋）范曄，《後漢書》，卷 24，〈馬援列傳〉，頁 842-843。

值得注意的是，這裡提到劉尚討伐的是武陵五溪蠻，馬援率領中郎將馬武等討伐的目標皆是「五溪」，而非「武谿」。

關於東漢軍隊討伐「武溪蠻」的說法，在《後漢書》和《續漢書》中也多有提及。如《後漢書·馬成傳》稱：「二十四年，南擊武溪蠻賊，無功，上太守印綬。」<sup>17</sup> 又《續漢書·五行志》亦有兩處：「〔世祖建武二十二年〕……其後武溪蠻夷反，為寇害，至南郡，發荊州諸郡兵，遣武威將軍劉尚擊之，為夷所圍，復發兵赴之，尚遂為所沒。」<sup>18</sup> 以及「〔建武二十五年〕……其冬十月，以武溪蠻夷為寇害，伏波將軍馬援將兵擊之。」<sup>19</sup>

至於「五溪」，其所指為沅水中上游的五條河流，但究竟是哪五條，歷來資料存在不同的記載。以南北朝的史料來說，《水經注》云：「武陵有五溪，謂雄溪、楠溪、無溪、西溪，辰溪其一焉。夾溪悉是蠻左所居，故謂此蠻五溪蠻也。」<sup>20</sup> 《宋書》則云：「所在多深險，居武陵者有雄谿、楠谿、辰谿、西谿、舞谿，謂之五谿蠻。」<sup>21</sup> 兩著作雖對「五溪」的描述相當類似，但五條河流中仍有「無溪」與「舞谿」之別。

我們還可以觀察成書於唐代的《元和郡縣圖志》是如何理解這場戰役，以及當時蠻人與政府的關係。據《元和郡縣圖志·辰州》稱：

〔辰州〕漢為武陵郡沅陵縣地。……光武時尤盛，其渠帥精夫、相單程等據險為寇。精夫者，蠻為渠帥者也。漢遣將軍劉尚，發兵萬餘人，泝沅水入武溪擊之。山深水急，舟船不得上，蠻緣路邀戰，漢軍皆沒。<sup>22</sup>

對李吉甫（758-814 年 11 月 18 日）而言，此場亂事發生於辰州，也就是漢代的沅陵縣。起兵的領袖除了蠻人精夫以外，也還有相單程（生卒年不詳）。此外，在此段文字之後就提到另外一種五谿的說法：「今西谿在州西，次南武谿、次南沅谿，

<sup>17</sup>（南朝宋）《後漢書》，卷 22，〈馬成傳〉，頁 779。

<sup>18</sup>（晉）司馬彪，《續漢書》，志 16，〈五行志四·地震〉，收入《後漢書》，頁 3327。

<sup>19</sup>（晉）司馬彪，《續漢書》，志 18，〈五行志六·日蝕〉，收入《後漢書》，頁 3359。

<sup>20</sup>（北魏）酈道元著，楊守敬、熊會貞疏，段熙仲點校，陳橋譯復校，《水經注疏》，卷 37，〈沅水〉，頁 3079。

<sup>21</sup>（南朝梁）沈約，《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卷 97，〈夷蠻傳〉，頁 2396。

<sup>22</sup>（唐）李吉甫撰，賀次君點校，《元和郡縣圖志》（北京：中華書局，2005），卷 30，〈江南道·辰州〉，頁 746。

次南辰谿，次東南熊谿，次東南朗谿。其熊、朗二谿與酈道元《水經注》不同，推其次第相當，則五谿盡在今辰州界也。」<sup>23</sup> 可以說李吉甫將相單程等人的起兵明確地與沅陵相結合，也與「五谿」相結合，並視為來自於沅水中上游的亂事。

由以上史料可以看出，歷來「五溪」所指哪五條河流，記載相當紛亂，既有包含「武溪」在內的說法，也有不包含「武溪」的說法。且這些皆屬於南北朝以後史籍的追溯，反而漢代魏晉的史料則記載為「武谿」。除了上述徵引的《續漢書》外，還有《東觀漢記》：「〔馬〕援擊武谿無功，卒于師，廖不得嗣爵。」<sup>24</sup> 以及〈武溪深〉：「滔滔武溪一何深，鳥飛不度，獸不能臨，嗟哉武溪多毒淫！」<sup>25</sup> 因此，周宏偉認為後起史料的追溯存在著記載上的問題，且沅水支流眾多，不只五條，「五溪」之名實有牽強附會之嫌，根本上乃是「武溪」之誤。故這場東漢初年蠻人起事的地點，應當就是在「武溪」。<sup>26</sup>

雖言馬援征討武谿，但首要任務是解救被進攻的臨沅縣，故大軍先直指臨沅縣，而在臨鄉遭遇蠻軍。臨鄉當為臨沅縣之屬鄉，為了對抗蠻軍，根據記載，馬援曾在沅水南岸築沅南城。《水經注》稱：「〔臨沅縣〕南對沅南縣，後漢建武中所置也。縣在沅水之陰，因以沅南為名。縣治故城，昔馬援討臨鄉所築也。」<sup>27</sup> 《太平寰宇記》亦稱：「武陵縣……本漢臨沅、漢壽二縣地，……後漢建武二十四年，武陵蠻叛，遣伏波將軍馬援率四將軍征討，破之於臨沅，蠻悉散走入林中，即此地也。」<sup>28</sup> 之後馬援軍順利擊敗蠻軍，蠻人不是被抓，就是逃散。

進軍臨沅縣之前，馬援大軍是先開拔至長沙郡下雋縣，商議進攻武陵蠻人的路線。當時諸將領為了進軍路線的問題產生分歧，此事記載於《後漢書·馬援傳》：

<sup>23</sup> (唐)李吉甫撰，賀次君點校，《元和郡縣圖志》，卷30，〈江南道·辰州〉，頁746。關於唐代時對五溪的另一種說法可見李賢對《後漢書》，卷24，〈馬援列傳〉的注就提到：「土俗『雄』作『熊』，『橘』作『朗』，『漁』作『武』」在今辰州界。」頁842。

<sup>24</sup> (南朝宋)范曄，《後漢書》，卷24，〈馬援列傳附子廖傳〉，李賢注引，頁843。

<sup>25</sup> (晉)崔豹，《古今注》，卷中，〈音樂第三〉，頁2。此詩前有序曰：「〈武溪深〉，馬援為南征之所作。援門生爰寄生善吹笛，援作歌以和之，名曰〈武溪深〉。」收錄於《諸子集成 補編(十)》(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據四部叢刊三編景宋本)。

<sup>26</sup> 周宏偉，〈「五谿」本義考〉，頁257-269。

<sup>27</sup> (北魏)酈道元著，楊守敬、熊會貞疏，段熙仲點校，陳橋譯復校，《水經注疏》，卷37，〈沅水〉，頁3089。

<sup>28</sup> (宋)樂史撰，王文楚等點校，《太平寰宇記》(北京：中華書局，2007)，卷118，〈江南西道十六·朗州〉，頁2380。



初，軍次下雋，有兩道可入，從壺頭則路近而水嶮，從充則塗夷而運遠，帝初以為疑。及軍至，耿舒欲從充道，援以為弃日費糧，不如進壺頭，搯其咽喉，充賊自破。以事上之，帝從援策。三月，進營壺頭。賊乘高守隘，水疾，船不得上。會暑甚。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遂困，乃穿岸為室，以避炎氣。<sup>29</sup>

當時在進軍路線的選擇上，有「充道」和「壺頭」兩條。耿舒（生卒年不詳）提出進軍充道的觀點，馬援則選擇進軍壺頭的意見。兩種意見僵持不下，程度嚴重到需皇帝支持馬援後才定案。不過針對這段文字提到「充賊自破」的字眼，成為學者支持馬援軍進攻目標為充縣的重要依據，認為此次進攻不管選擇哪條路線，目標皆為澧水、澧水流域上的充縣。只是後來馬援選擇進軍壺頭，困於壺頭且病死，無法達成原先的目的。

不過這樣的理解不無疑問。就「壺頭」而言，據李賢注：「山名也，在今辰州沅陵東。《武陵記》曰：『此山頭與東海方壺山相似，神仙多所游集，因名壺頭山』也。」<sup>30</sup> 又《水經注》稱：「夷山東接壺頭山，山高一百里，廣圓三百里。山水下際，有新息侯馬援征武溪蠻停軍處。壺頭徑曲多險，其中紆折千灘。援就壺頭，希效早成，道遇瘴毒，終沒于此。」<sup>31</sup> 則壺頭山在沅陵東，且山腳下路途難行且曲折，都符合當時對於壺頭的觀察。相對地，同樣進軍充縣，若走沅水經壺頭山比起從充道進充縣則較遠，未必符合「從壺頭則路近而水嶮，從充則塗夷而運遠」的說法。再配合上述分析，建武二十三年蠻人起事於沅水中游，此次馬援軍卻將主要目標指向澧水、澧水流域的充縣，也存在難解之處。

若我們觀察《後漢紀》對此件事情的記載，就會發現爭論的內容與《後漢書·馬援傳》稍有不同：

蠻有二道，一曰壺頭，二曰充中。壺頭徑近而多險，充中遠而運糧難。初，上與諸將議所先擊，因以疑而未決。軍至長沙，中郎將耿舒上言先擊充中賊。援以為延日費糧，不如進攻壺頭。賊乘高守隘，船不得進。會夏暑熱，吏士疫死

<sup>29</sup>（南朝宋）范曄，《後漢書》，卷24，〈馬援列傳〉，頁843。

<sup>30</sup>（南朝宋）范曄，《後漢書》，卷24，〈馬援列傳〉，頁843。

<sup>31</sup>（北魏）酈道元著，楊守敬、熊會貞疏，段熙仲點校，陳橋驛復校，《水經注疏》，卷37，〈沅水〉，頁3085。

者多，援亦病困，穿岸爲室，以避暑氣。<sup>32</sup>

這裡同樣提到進軍路線有兩條：壺頭和充中，且對於兩條路線優劣的描述，以及耿舒和馬援意見的相左也是類似的。最關鍵的差異是《後漢紀》記載中的「上與諸將議所先擊」和「中郎將耿舒上言先擊充中賊」之「先」為《後漢書》所無，但也缺《後漢書》中「搯其喉咽，充賊自破」的意見。配合兩段文字看來，既然有「先」，便應有「後」；那麼可知充縣蠻人不是唯一的目標。其實，《後漢書·馬援傳》也收錄了事後耿舒抱怨馬援的意見，當中同樣提到進軍目標有先後的說法：

耿舒與兄好時侯弇書曰：「前舒上書當先擊充，糧雖難運而兵馬得用，軍人數萬爭欲先奮。今壺頭竟不得進，大眾怫鬱行死，誠可痛惜。前到臨鄉，賊無故自致，若夜擊之，即可殄滅。伏波類西域賈胡，到一處輒止，以是失利。今果疾疫，皆如舒言。」<sup>33</sup>

此中一樣提到「當先擊充」。如上討論，馬援的目標當是沅水中游的武谿蠻。那麼可以推論得出耿舒的意見當為先擊充中賊，後擊五溪蠻。魏斌雖從「當先擊充」這條史料，推論蠻人的勢力甚廣，並不僅限於充縣。但仍囿於「充賊」的觀點，認為充縣仍是蠻人起事的策源地與核心區。<sup>34</sup> 然而從上述整體蠻亂的局勢發展看來，武谿地區才應當是策源地與核心區，也是東漢軍隊最終要收復之地。<sup>35</sup> 因此，兩條進攻路線的選擇，並非皆指向同一目標，而是有不同的目的地，故有先後輕重緩急之別。

馬援的目標在武谿不在充縣的證據，還可觀察馬援死後東漢軍隊的動向。《後漢書·宋均傳》提到：

<sup>32</sup> （南朝宋）范曄，《後漢書》，卷 8，〈光武皇帝紀〉，頁 146。

<sup>33</sup> （南朝宋）范曄，《後漢書》，卷 24，〈馬援列傳〉，頁 844。

<sup>34</sup> 魏斌，〈古人堤簡牘與東漢武陵蠻〉，頁 68。

<sup>35</sup> 魏斌的輔証是土家族的傳說與時代較晚的方志，稱相單程出生於桑植縣內澧水南源的上峒，但並無提供明確證據，見魏斌，〈古人堤簡牘與東漢武陵蠻〉，頁 68。另外，羅維慶、羅中認為馬援的進軍路線為沿澧水行進，壺頭山為天門山，當地亦有水名為武谿。不過其文證據除一兩條來自於《水經注》外，其餘也多來自於明清的方志。見羅維慶、羅中，〈馬革裹屍何處還——馬援征武陵蠻殒地新考〉，頁 84-86。本文以為，明清方志的記載並非全然不可信，不過有些記載在此之前完全沒有著錄，相隔千年以後才出現於方志之中，不能排除存在附會的可能性。故在沒有進一步的證據之下，充縣作為東漢軍隊進攻的主要目標此一論點較難成立。

後為謁者。會武陵蠻反，圍武威將軍劉尚，詔使均乘傳發江夏奔命三千人往救之。既至而尚已沒。及馬援卒於師，軍士多溫溼疾病，死者太半。〔宋〕均慮軍遂不反，乃與諸將議曰：「今道遠士病，不可以戰，欲權承制降之何如？」諸將皆伏地莫敢應。均曰：「夫忠臣出竟，有可以安國家，專之可也。」乃矯制調伏波司馬呂种守沅陵長，命种奉詔書入虜營，告以恩信，因勒兵隨其後。蠻夷震怖，即共斬其大帥而降，於是入賊營，散其眾，遣歸本郡，為置長吏而還。<sup>36</sup>

劉尚陷入困境時，宋均（？-76）以謁者身分率領江夏奔命三千人前往救援。奔命的意義，於此注引《前書音義》曰：「擢選精勇，聞命奔走，謂之奔命。」<sup>37</sup> 可說是急行軍，但宋均軍仍是無法在劉尚死前趕到。後來宋均率領的奔命當與馬援軍會合。在面對眾士兵重病，包括馬援在內多人病死的情況下，宋均急中生智以矯制的方式上演了一齣戲。宋均以馬援手下的司馬呂种（生卒年不詳）擔任沅陵縣長，奉詔書入進入蠻人軍營，宣達東漢皇帝的恩情，並在身後以軍隊助威，成功地震懾蠻人。結局以處決蠻酋相單程，蠻人各自回到「本郡」，並設置長吏作結，東漢軍隊也才順利撤出。在此值得注意的是，司馬呂种擔任的是沅陵縣長，沅陵縣亦即上述提到武谿流經，劉尚曾在附近築城防禦蠻人的地點。若說這齣戲能夠成功達成宋均原本預想的目的，無非就是這些蠻人原本就是來自於武谿，東漢政府軍最終平亂的目的地也在武谿一帶，而這些蠻人平時正是受到沅陵縣的管轄。只是經過多年戰役，原沅陵縣長可能同樣身沒或逃亡，故宋均需找人頂替，結果也如宋均預期般達到效果，順利地平息此次蠻人對東漢政府的反抗。

由此看來，東漢政府軍的目標始終在武谿，儘管馬援生前未盡其功，但最後軍事據點的目標就是在沅陵縣。而沅陵縣對於控制沅水中上游的重要性在《水經注》中也有提到：「沅水又東逕縣故治北，移縣治，縣之舊城置都尉府。因岡傍阿，勢盡川陸，臨沅對西，二川之交會也。西水導源益州巴郡臨江縣，故武陵之充縣西源山，……」<sup>38</sup> 此處有兩個重點。其一，西水是來自於充縣的西源山。<sup>39</sup> 這很能說明

<sup>36</sup> （南朝宋）范曄，《後漢書》，卷41，〈宋均傳〉，頁1412。

<sup>37</sup> （南朝宋）范曄，《後漢書》，卷41，〈宋均傳〉，頁1412。

<sup>38</sup> （北魏）酈道元著，楊守敬、熊會貞疏，段熙仲點校，陳橋譯復校，《水經注疏》，卷37，〈沅水〉，頁3082。

<sup>39</sup> 據熊會貞考疏，認為「故武陵之充縣西源山」當是校注者注記之文，後混入正文。然這數字注記，正好說明了充縣轄地包括了澧水與西水之上游。見（北魏）酈道元著，楊守敬、熊會貞疏，段熙仲點校，陳

充道的路線正是沿著澧水、澧水流域上溯至充縣後，轉由酉水下至沅陵縣。<sup>40</sup> 由此，就可理解「從壺頭則路近而水嶮，從充則塗夷而運遠」的說法。畢竟，逆沅水而上沅陵至武谿，走澧水流域經充縣繞酉水再回到沅陵的充道較遠，經壺頭山則距離較近。

其二，沅陵縣位於沅、酉二水交會處，扼守了沅、酉二水交通的出入。雖然武谿、酉水皆在沅水流域，充縣則在澧水流域，分屬不同的河域；然而既然經由充道可聯繫酉水與澧水，那麼從實際的交通角度觀察，武谿與西、澧水流域當屬不同的交通網路，而能控制兩者的地點就在沅陵縣。據此，可以重新理解耿舒與馬援在作戰路線上思慮的差異。自建武二十三年（47）以來，起事蠻人的主力在武谿，充縣的蠻人很可能是武谿蠻進攻臨沅縣後才相呼應。故耿舒的構想是穩紮穩打，先進攻次要的充賊，雖路途遠而耗時，但因地勢平坦兵馬得以發揮戰力。馬援所謂的「搯其喉咽，充賊自破」則可理解為從沅水逆流而上，儘管地勢較險，但集中進攻主力，並佔據要地，主力若遭擊敗，則充賊無所依靠，便會自破。馬援與耿舒進軍路線構想的差異與屯戍的設立，可參考文後的圖一「東漢馬援伐蠻路線與屯戍體系示意圖」。

總之，東漢建武二十三年（47）的這場蠻人起事因記載紛亂，導致學界對此事發生地點、漢朝進軍路線等產生歧異的說法。據上述考察，以相單程為首的蠻人起事地點當在武谿，「五溪」作為後起的說法，因歷代指稱「五溪」的具體內容不一，並不精確，徒增此課題的困擾。此外，既然起事地點在沅水流域的武谿，就非部分學者認為的是在澧水、澧水流域上的「充縣」。「充縣」賊雖有起事，但充其量是呼應武谿蠻人而已，故僅成為漢朝軍隊平亂時的次要目標。

### 參、東漢武陵郡的防禦體系：屯戍與築城

先秦華夏諸國為了防範外敵，已發展出各種軍事設施，諸如關梁、長城、亭障等，且通常安排重兵駐守。秦朝對南方越人和北方匈奴的討伐，以及漢武帝以後對匈奴、羌人持續且大規模的戰爭中，都可見到大量的邊防軍。為了達成有效的邊防效果，不斷興築眾多的軍事設施，以及修繕既有的要塞、亭障等都是邊防軍重要的

橋譯復校，《水經注疏》，卷 37，〈沅水〉，頁 3082。

<sup>40</sup> 伍新福認為耿舒從充道的路線，即沿武陵山和酉水進入沅陵，當為卓識。然文中未有徵引與討論，甚為可惜。見伍新福，《湖南民族關係史》，第二章，〈秦漢至南北朝時其湖南民族與民族關係〉，頁 130。

職責。<sup>41</sup> 相對於這些邊疆的軍事設施與軍隊駐防，東漢武陵郡針對於蠻人的屯戍佈署又是如何呢？以下就以魏斌的研究為基礎，從事進一步地討論。

### 一、古人堤簡牘與東漢武陵地區伏波等軍營

關於東漢武陵郡政府針對當地蠻人的屯戍佈署的線索，魏斌是由張家界古人堤 10 號簡牘作為切入點展開的。此簡牘為一文書封檢，正面記有三行文字：

充長之印

兵曹掾猛使福以郵行

永元元年十二月廿日新丑起廷

據魏斌的考察，認為此封檢來自於充縣縣廷，發出的時間為永元元年（89）十二月廿日，收件者為兵曹掾猛。而古人堤的所在地官府，除了兵曹外，尚有功曹、賊曹等吏員。以目前對於秦漢郡縣地方政府的理解，郡縣常分部，有中部、西部、東部等區別，許多郡縣吏員是在郡府、縣廷以外的治所理事。由此而論，古人堤作為充縣的分理機構可能性很高。<sup>42</sup>

至於 10 號背面則記載著對眾多兵士的統計欄表，出現了以驃騎、伏波、揚武、武威四將軍號標誌兵士的類別：

□中右部士卅人      伏波卅四人

剽（驃）騎士卅人      城中左部卅六人

黃弩卅三人

雁門士五十三人

中部士卅四人

<sup>41</sup> 概括性的討論可參見黃今言，《秦漢軍制史論》（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第 5 章，〈邊防軍〉，頁 168-202。

<sup>42</sup> 魏斌，〈古人堤簡牘與東漢武陵蠻〉，頁 71-75。

揚武士卅四人

武威士卅六人

惟管卅三人

據此，魏斌認為當中的分類名號，除惟管意義不明外，黃弩當屬特殊兵種；城中左、右部和中部的「部」當屬漢朝軍隊中的編制，即「部曲」之部，但因有城中之名，故當是城中駐紮的軍隊。此外，伏波、揚武、武威三個將軍號可追溯到上述建武年間戰役中的伏波將軍馬援、揚武將軍馬成和武威將軍劉尚。

換言之，從建武二十五年（49）蠻人起事被東漢政府平定後，長達半個世紀，武陵郡仍存在以此三個將軍號命名的屯營，而設置的目的當在監控蠻人反政府頻繁的淩水和澧水流域。<sup>43</sup> 屯戍性質與軍事相關，需要由充縣的兵曹掾管理，故由縣廷發文通知古人堤所在地之兵曹。此中每項人數除雁門士五十三人外，其餘皆三十至四十人不等，總計三百七十三人。然而此軍營的人員統計表的意義為何？因為簡牘內容殘缺，不易判斷。魏斌推測是充縣戶口中有兵士身分的統計。<sup>44</sup> 然而兵士的類別除了存在與將軍號相關的名稱外，有稱「部」者，不同的命名方式暗示不同的來源。再據下文討論武陵郡軍糧的運送量，以及伏波營隸屬武陵郡的情況看來，都說明並非只是單純對充縣戶口中有兵士身分的統計。相對地，從各營人數相對接近的情況來說，更有可能是因需執行某項任務，各營派出數量相去不遠的兵士集結於充縣某地，而此文書就是針對此次集結兵士身分的統計。

另外，古人堤簡牘 22 背面也有一些關於當時屯戍要塞的相關記載：

朱（？）□ 李金 唐陽 朱康

華邊 張角 梅直 梅昌

□□ 蕭□ 梅子 蔡次 城長卅丈

韓萬 梅朋 重陽

<sup>43</sup> 魏斌，〈古人堤簡牘與東漢武陵蠻〉，頁 63-69。

<sup>44</sup> 魏斌，〈古人堤簡牘與東漢武陵蠻〉，頁 67。

當中「城長卅丈」的記載，折合今制約九十餘公尺。以其規模看來，魏斌推測出是個規模不大的屯戍城址。<sup>45</sup> 另外，此屯戍城址之名則很可能為簡牘 22 正面提到的「陽遂」。根據整理者的推測，此資料很可能是修繕築城的人員名單。<sup>46</sup> 類似的勞動記錄尚可見於簡牘 32 正面：「□□□人卅東□ 凡九十□□ 喬高四丈長三丈□。」<sup>47</sup>

由此看來，古人堤所在地之官府，負責許多屯戍軍事人員的調動，和修繕築城人員的安排等事務，軍事方面的職能很明顯。值得注意的是，當初這些派往武陵地區攻打蠻人的軍隊，多來自於武陵以外，如劉尚的軍隊是來自「南郡、長沙、武陵兵萬餘人」。之後劉尚軍陷入危急，宋均率領的是「江夏奔命」，也是鄰郡的軍力。而馬援的大軍，則是「十二郡募士及弛刑四萬餘人」。但至永元元年（89）時，這些軍營名稱雖然留用，但組成份子應該都轉變成為由武陵郡人充任。之後東漢武陵郡各次蠻人與政府的衝突，已少見由朝廷派外郡兵力征伐，而改由郡兵和蠻兵作戰，此點在後文會再舉證討論。於此要說明的是，既然由當地郡縣人充役，那麼屯戍的性質上很可能轉變成為「內徭」，這些人的身分則為更卒。屯戍人員的身分，透過古人堤簡牘 22 背面的人員名單中亦可看出。在這十四人中，就有四人為梅姓。「梅」通「梅」，可見於吳簡之中，被學者視為蠻姓。<sup>48</sup> 古人堤簡牘中見此梅姓，雖然可參考的資料數量不多，但應仍能反映當地蠻人已被編入戶籍中，甚至被要求屯戍的可能性甚高，亦可作為當地郡縣民充役的佐證。

關於古人堤所提及伏波、建威等軍營的規模，雖未記載，卻可從另外一條新出土資料間接觀察。東漢長沙五一廣場 J1③：325-1-140 號木牘，記載了一個永元十五年（103）涉及軍糧運輸的糾紛案件，當中就提到在武陵屯戍的伏波軍營：

永元十五年閏月丙寅朔八日癸酉，武陵大守伏波營軍守司馬郢叩頭死罪，敢言之。前言船師王皮當償彭孝夫文錢，皮船載官米，財（纔）遺，孝家從皮受錢。郢叩頭叩頭死罪死罪，皮船載米四千五百斛，已重，孝不成。今月六日遣屯長

<sup>45</sup> 魏斌，〈古人堤簡牘與東漢武陵蠻〉，頁 77。

<sup>46</sup>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國文物研究所，〈湖南張家界古人堤簡牘釋文與簡注〉，頁 78。

<sup>47</sup> 此種由各營派出數量相去不遠的兵士集結於某地執勤，可能類似漢簡中的「省卒」記錄，可參考于豪亮，〈居延漢簡中的「省卒」〉，《文物》，第 11 期（1963），頁 44-46。

<sup>48</sup> 在已公佈的吳簡中，於《竹簡（壹）》，下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和《竹簡（貳）》，下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中都將「梅」釋作「梅」，《竹簡（參）》，下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以後，已將釋文改為「梅」。

王于將皮詣縣與孝誼（議），詆（抵）未到，亭長姓薛不知名奪收捕皮穀（繫）亭。案：軍糧重事，皮受餽米六百卅斛，當保米致屯營，今收穀（繫）皮，空船無攝護者。亭重船稽留有日，不得發，恐宿夜災異，無誰詭責。郢客吏，被蒙府厚恩發遣，正營流汗，唯長沙府財（裁），吏馬嚴臨湘晨夜遣當代皮攝船者詣，郢須進道。皮訟決，手械，部吏傳詣武陵臨沅，保入官。朱郢誠惶誠恐，叩頭叩頭死罪死罪，敢言之。<sup>49</sup>

此次案件起因為一船師王皮（生卒年不詳），負責從長沙臨鄉運送軍糧前往武陵，但與彭孝（生卒年不詳）有金錢上的糾紛，擱置運送軍糧的事務。原本是武陵伏波營方面透過一位屯長王于（生卒年不詳）帶王皮前往商討債務糾紛，但王皮並不配合。可能因而彭孝請求臨湘縣出面處理，使得王皮被臨湘縣的薛姓亭長扣留，船隻也無法出發，導致預計要送往武陵臨沅的軍糧無法到達。因此，在武陵伏波營的司馬朱郢寫此文書傳遞至臨湘縣，表達運送軍糧的重要性，希望長沙郡迅速派人押送王皮，盡快解決此事。

透過此木牘，學者已指出可反映的若干面向。首先，「伏波營」的存在證實了至永元十五年武陵郡對武陵蠻的戍守軍營仍然存在，而古人堤簡牘中揭露的其餘驃騎、揚武、武威等軍營亦可能尚存。其次，當時武陵戍守軍營的軍糧來自於長沙郡，且是招募民間船師，透過水路運送。對此，在較晚時期的吳簡中也都可以發現船師、舵師運送軍糧的情況，皆說明從長沙郡運送軍糧至武陵郡應該是一個長期存在的現象。<sup>50</sup>再者，因為運送軍糧倚靠的是水運，故學者認為應該是沿著湘江至洞庭湖，再從洞庭湖逆沅水而上至臨湘。這是一條迂迴的路線，故也有學者提出是否有輔助的陸路路線。不過根據船師王皮的案件看來，文件中再三強調運送軍糧的重要性時，面對船隻的扣留使軍糧無法運送，卻又未提及其他的替代方式，只要求盡速解決看來，水路運送不但可能，也應該是最重要運送軍糧的方式。尤其是在數量方面高達米四千五百斛，非常龐大。這可與吳簡中記載吳國初年同樣由長沙運往武陵的數量相比，如：

<sup>49</sup> 此段引文根據劉樂賢的釋讀，見〈長沙五一廣場出土東漢王皮木牘考述〉，頁 58。

<sup>50</sup> 針對走馬樓吳簡中軍糧運輸記載的相關研究，可參見羅新，〈吳簡中的「督軍糧都尉」簡〉，《歷史研究》，第 4 期（2001），頁 168-170；侯旭東，〈吳簡所見「折成米」補釋——兼論倉米的轉運與吏的職務行為過失補償〉，《吳簡研究》，第 2 輯（武漢：崇文書局，2006），頁 176-191。



· 准廩斛米一千八百□斛□斗五合被督軍糧都尉 (1· 8227)

三千五百斛通合吳平斛米四千一十斛被督軍糧 (1· 2077)

其三千八百斛合□□□□七千六十斛被督軍糧都尉嘉禾元年三月四日庚午書付 (1· 1760)

據學者研究，廩斛和吳平斛兩者間的換算比為 1：0.96，且前者可能為漢舊制，後者乃為孫吳新制。<sup>51</sup> 從一千多斛至七千多斛的記載看來，四千五百斛剛好介於之間，都可以說是大量的軍糧運輸。至於軍糧運送的路線與古人堤的位置，可參考後文的圖二「東漢古人堤與伏波營的軍糧運送路線示意圖」。

據學者討論，漢代士兵一人一月的口糧約為二斛，那麼王皮原要運送的軍糧可滿足約一個月二千二百五十名屯戍兵的食用。因為簡牘中未透露每次運送軍糧的間隔，各郡縣政府也都設有倉庫囤放軍糧，故船師王皮所運送的軍糧未必一個月內食用完畢。若以古人堤 10 號簡牘中的三百七十三人計算，則約半年。不過如吳簡 (1· 1760) 所揭示的時間為嘉禾元年 (232) 三月，當時正值潘濬領軍進攻武陵蠻。而王皮運送軍糧前往武陵臨沅的時間點，並無東漢政府軍討伐武陵蠻的戰事，軍糧的運送量仍然很大，這不就暗示了食用此批軍糧的軍隊人數不會太少。

又從五一廣場 J1③：325-1-140 號木牘中可看出，伏波營隸屬武陵太守，當中有軍守司馬、屯長等職。《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牘選釋》的第 56 枚木簡，標號為 CWJ1③：325-2-8 中尚有關於此事的線索：

文書來問王皮。郢住憲、元下津嶺上，炊一石米，乃命王屯長來問憲、元，府廷書何在？憲輒以書付王屯長持視。郢飯頃，王屯長還，言皮不可得。時郢與<sup>52</sup>

此木簡為兩行書寫。由內容可知，此事當為王皮案件的後續處理，表示在編號 J1③：325-1-140 號木牘發出之後，事情仍未解決。據學者指出，其內容當是軍守司馬朱郢長與屯長王于也都來到長沙臨湘處理此事，接洽了臨湘縣廷的官員憲和元兩

<sup>51</sup> 于振波，〈走馬樓吳簡習語考釋〉，《走馬樓吳簡初探》（臺北：文津出版社，2004），頁 228-233；羅新，〈也說吳平斛〉，《吳簡研究》，第 2 輯（武漢：崇文書局，2006），頁 192-200。

<sup>52</sup> 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編，《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牘選釋》（上海：中西書局，2015），頁 164。

人，但此案似乎仍沒有結果。<sup>53</sup> 從事件發生開始的文書往來到後續事件處理的單位與人員，始終都相同的這一點看來，說明處理此次軍糧運送的爭論中，武陵郡方當在伏波營。從編號 J1③：325-1-140 到 CWJ1③：325-2-8 中所記載的，改變的只有處理的方式，即原是武陵郡伏波營方希望臨湘縣方面能處理，轉變為軍守司馬朱郢和屯長王于都來到臨湘縣處理此事。事件從頭到尾沒有其他軍營介入，也可說明此次軍糧運輸的接收單位似乎就是伏波營，與他營無關，並可推知這批軍糧就是提供伏波營軍營的人員食用。如此一來，更可說明當時設立於武陵地區的各軍營人數不會太少。

此外，還可透過其他地區的出土資料，以及史書中若干屯戍的例子進行參照以及推估。首先，魏斌以四川昭覺出土的東漢石碑為例。此石碑出土的好谷鄉是東漢時期控禦印都蠻夷的重要據點，且碑文中提到了「沖要」，表示設置在要害處。其次，碑文也存在「百人以為常屯」、「二百人」的記載，也顯示了這個據點駐守人員的規模。<sup>54</sup>

其次，東漢章和二年（88），護羌校尉張紆（生卒年不詳）誘殺燒當種羌迷吾等人後，引發諸羌起事。當時鄧訓（生卒年不詳）被推舉處理此羌人起事，有人提出以夷攻夷的策略，但鄧訓反對，認為：

今張紆失信，眾羌大動，經常屯兵，不下二萬，轉運之費，空竭府帑，涼州吏人，命縣絲髮。原諸胡所以難得意者，皆恩信不厚耳。今因其迫急，以德懷之，庶能有用。<sup>55</sup>

故鄧訓改採溫和安撫的策略。甚至在亂平之後，主動裁撤屯兵數量：「於是綏接歸附，威信大行。遂罷屯兵，各令歸郡。唯置弛刑徒二千餘人，分以屯田，為貧人耕種，修理城郭塙壁而已。」<sup>56</sup> 鄧訓處理羌亂的時間與古人堤簡牘相當接近，其中對於屯兵的安排由原本的二萬人，縮減到罷屯兵後的二千餘人，且剩餘的屯兵主要是由弛刑徒充任。「弛刑徒」據學者研究，指的是漢代皇帝下詔去掉罪衣和械具

<sup>53</sup> 劉國忠，〈五一廣場東漢簡王皮運送軍糧案續論〉，頁 250-253。

<sup>54</sup> 魏斌，〈古人堤簡牘與東漢武陵蠻〉，頁 78。石碑內容則見涼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館、昭覺縣文館所，〈四川涼山州昭覺縣好谷鄉發現的東漢石表〉，《四川文物》第 5 期（2007），頁 83。

<sup>55</sup> （南朝宋）范曄，《後漢書》，卷 16，〈鄧訓傳〉，頁 609。

<sup>56</sup> （南朝宋）范曄，《後漢書》，卷 16，〈鄧訓傳〉，頁 611。

的刑徒，通常用於戍守與作戰。在東漢以後募兵制逐漸盛行，刑徒在軍隊組成的比重也在增加。<sup>57</sup> 他們的任務為修繕城牆與要塞和耕種屯田，甚至這不全為自己生產，還為了照顧窮人。換言之，隨著屯兵的罷廢，原尚有出征的任務，僅剩防禦的功能，人員的身分也變單一，僅以刑徒為主力。

由此也可思考在古人堤簡牘和五一廣場簡牘中出現伏波營等屯戍的規模。據《後漢書》記載，自建武二十五年以後，蠻人大規模的起事一直要到建初元年（76）才爆發，是由來自濃中、澧中等地的蠻人發起，直到建初五年（80）才完全平定，且在同年「罷武陵屯兵」。然古人堤簡牘中的永元元年（89），五一廣場簡牘中的永元十五年（103）都是在此之後，伏波營等武陵地區的屯營繼續存在。這可能說明了包括伏波等屯營在建初五年（80）時僅僅只是有所縮編，或裁撤部分屯營，或減少各軍營的人數。但即使如此，軍營數量仍多，且人數依舊不少，這可反推在建初五年，東漢政府尚未「罷武陵屯兵」之前，針對武陵蠻所建立起的屯戍，整體規模應該更大。

## 二、武陵郡的屯戍體系

這些屯戍儘管整體數量不少，但可能因為分散各處，且規模太小，難以進入史家的眼簾。<sup>58</sup> 然而正如上述討論建武年間平定的這場戰役過程，東漢政府軍為了平定起事的蠻人，曾築了不少城。且除了東漢軍隊進軍時所築之城以外，尚有一些城池也在這場戰役的不同階段中興建，只是時間較不精確。對此，以下略作討論。

首先，馬援在討伐蠻人時，尚有一些築城記載。如有一座名為馬援的城池，座落於澧水流域。據《輿地紀勝》的記載：「馬援城，在澧陽東五十里。《類要》云：『援征南時所築。』」<sup>59</sup> 不過正如上述討論，馬援在討伐蠻人時，選擇壺頭山的路

<sup>57</sup> 參見黃今言，《秦漢軍制史論》，第2章，〈兵員的征集〉，頁45-121。另可參見高震寰，〈從勞動力運用角度看秦漢刑徒管理制度的發展〉，（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研究所博士論文，2017），第4章，〈漢朝刑徒運用的新辦法：復作與弛刑〉，頁92-98。

<sup>58</sup> 郡縣內屯戍於各地據點情況的例證，可舉西漢初年長沙國箭道的情形。據邢義田的研究，箭道內的幾個都尉軍的所在是在鄉，需要糧草與民伕擔任後勤。不過東漢武陵郡的情況與西漢長沙國的情況可能並不完全相同，畢竟上述討論武陵郡的軍糧來自於長沙郡的提供，表明物資來源未完全由本地支持。參見邢義田，〈論馬王堆漢墓「駐軍圖」應正名為「箭道封域圖」〉，《治國安邦：法制、行政與軍事》（北京：中華書局，2011），頁346。原刊於《湖南大學學報》，第21卷第5期（2007），頁12-19。

<sup>59</sup> （宋）王象之撰，李先勇點校，《輿地紀勝》，卷70，〈澧州〉，頁2443。

線，且病困於壺頭山，未嘗有循澧水進攻充縣的記錄。故此城名為「馬援」，稱其為馬援南征時所築，當為附會。可能的實情是，此馬援城是與古人堤簡牘記載的屯戍是類似的，是為監控澧水和澧水流域蠻人活動而設，是在亂後建立起的建築，屬於屯戍體系的一環。

其次，宋均抵抗蠻人時，亦有築城的記載：「平阿故城，在沅陵縣，光武時蠻反，宋均築此城以拒之。」<sup>60</sup> 平阿故城的明確位置不詳。至於宋均在戰爭期間何時到過沅陵，史未記載，故平阿城興築的時間僅能推測，可能時間有二。首先，宋均救援劉尚時，劉尚已死，宋均軍隊當與蠻人直接衝突，平阿故城或築於此時。若是如此，在馬援軍南征前，東漢軍隊節節敗退難以固守，此城效果恐怕有限。其次，在馬援死後，東漢政府軍隊亦病死大半，在宋均的策略下，蠻人最終散去，宋均以「置長吏」作為安撫蠻人的手段，故亦有可能於此時興築平阿故城。兩者相較，前者時間蠻人與東漢政府衝突正在持續中，能築城的可能性較小；後者是衝突已告一個段落，東漢政府為求穩定沅水中上游的秩序，此時築城可能性較高。

此外，還存在修建舊城，而非是築新城的情況。這與武陵郡發展重心的轉移有著密切關聯。建武二十五年武陵蠻起事平息後，就接著有武陵郡治遷移的舉措。武陵郡治由原本位於沅水中游的義陵遷移到下游的臨沅，《續漢書志》劉昭注引《先賢傳》提到：

晉代太守趙厥問主簿潘京曰：「貴郡何以名武陵？」京曰：「鄙郡本名義陵，在辰陽縣界，與夷相接，為所攻破，光武時移東出，遂得見全，先識易號。傳曰『止戈為武，高平曰陵』，於是改名焉。」<sup>61</sup>

雖然劉昭已經指出，潘京對於武陵之名說法由來有誤。<sup>62</sup> 不過此對話卻清楚道出武陵郡治遷移的原因與時間乃為：「與夷相接，為所攻破，光武時移東出，遂得見全」。這說明了武陵郡治的遷移雖牽涉東漢政府的主動意念，但也與當時義陵縣的殘破有關。又據《輿地紀勝》引《元和郡縣志》云：「〔張若故城〕在州東四十步，

<sup>60</sup> (宋)王象之撰，李先勇點校，《輿地紀勝》，卷75，〈辰州〉，頁2650。

<sup>61</sup> (晉)司馬彪，《續漢書》，志22，〈郡國志四〉，收入《後漢書》，頁3484。

<sup>62</sup> (晉)司馬彪，《續漢書》，志22，〈郡國志四〉，劉昭注，「前書本名武陵，不知此對何據而出。」收入《後漢書》，頁3484。

初，秦昭王使白起伐楚，遣張若築此城以拒楚，并統五溪。後漢梁松（？- 61）伐蠻又修此城，自義陵移郡理之。」<sup>63</sup> 關於梁松，貴為光武帝駙馬，朝廷官員多所禮遇，但馬援卻不為所動，梁松因而懷恨在心。在馬援病困於壺頭山時，耿舒便寄給兄長好時侯耿弇一封書信。信中內容便是上述提到，關於耿舒抱怨馬援軍事決策上的失當。此書信後被奏起光武帝，光武帝便派梁松擔任監軍調查此事。在馬援死後，梁松可說是構陷馬援死後名聲的元兇，<sup>64</sup>但他也是與宋均共同收拾殘局的重要人物，處理戰後事宜。梁松除了整修張若故城，使武陵郡治由義陵遷移到臨沅外，據唐朝董挺〈修陽山廟碑〉稱：「東漢光武二十五年，駙馬都尉梁君松平五溪，名郡廨，置漢壽城，即荊州刺史所治。」<sup>65</sup> 似亦對漢壽城的荊州刺史治所同樣有所整治。

此外，當初馬援於臨沅擊退蠻軍時，為鞏固臨沅縣城，除了上述提到在南岸興建後來的沅南城，還補強了司馬錯故城。《輿地紀勝》引《元和郡縣志》云：「（司馬錯故城）在武陵縣西二里，錯與張若伐楚黔中，相對各築一壘，以扼五溪咽喉。後馬援又修之。」<sup>66</sup> 配合張若故城的記載，可知戰國晚期秦國派遣司馬錯與張若進攻楚國的黔中郡，就在後來的臨沅縣週遭的沅水兩岸各築一軍事堡壘，一方面鞏固秦國勢力以防範楚國反擊，另一方面也扼守沅水中游以上的蠻人。只是後來北岸的張若城成為東漢武陵郡治，南岸的司馬錯城仍為軍事要塞。

以上不管是遷移郡治，打造新城，興建舊城等，均可發現在建武二十五年後，東漢政府在武陵郡是以沅水下游為核心，打造新的屯戍體系。相對地，也是放棄對位於沅水中游義陵的經營。對此，魏斌已指出在地理空間上，郡治的遷移應與澧水和澧水流域蠻人有關，目的是為了避免被切斷武陵郡與週遭郡治之間的聯繫，希望能化被動為主動。<sup>67</sup> 但實際上，原郡治義陵縣位於序溪，在今溆浦附近。《水經注》稱：「沅水又東與序溪合，水出武陵郡義陵縣酈梁山，西北流逕義陵縣，王莽之建平縣也，治序溪。」<sup>68</sup> 較沅陵更處沅水上游，五溪蠻起事時，義陵縣即被攻破。劉尚

<sup>63</sup> （宋）王象之撰，李先勇點校，《輿地紀勝》，卷 68，〈常德府〉，頁 2443。

<sup>64</sup> （南朝宋）范曄，《後漢書》，卷 24，〈馬援列傳〉，「弇得書，奏之。帝乃使虎賁中郎將梁松乘驛責問援，因代監軍。會援病卒，松宿懷不平，遂因事陷之。」頁 844。

<sup>65</sup> （唐）董挺，〈修陽山廟碑〉，收入（清）董誥，《全唐文》（北京：中華書局，1983），卷 684，頁 7002。

<sup>66</sup> （宋）王象之撰，李先勇點校，《輿地紀勝》，卷 68，〈常德府〉，頁 2443。

<sup>67</sup> 魏斌，〈古人堤簡牘與東漢武陵蠻〉，頁 80。

<sup>68</sup> （北魏）酈道元著，楊守敬、熊會貞疏，段熙仲點校，陳橋驛復校，《水經注疏》，卷 37，〈沅水〉，頁 3077。

軍與後來的宋均在與蠻人抗衡時，沿沅水進軍頂多僅至沅陵一帶。雖說衝突結束以後，蠻人各回故里，東漢政府在沅水上游尚設有一潭城縣，並非完全喪失控制力，但顯然與過往相差甚多。不選擇重建郡治而選擇遷移，東漢政府的考量恐怕還是針對五溪蠻而來。

除了行政中心的轉移與軍事要塞的興建外，還可觀察舊有縣治的興廢。在遷徙郡治外，上述提到由馬援在臨沅南岸興築之城，於隔年升格為沅南縣。《續漢書·郡國志》稱：「建武二十六年置。」<sup>69</sup> 因此，原有馬援興築的軍事要塞，在衝突結束後隔年就已成為新縣廷之所在。另外，武陵郡於東漢的新縣還有位在澧水下游的作唐。此縣設立時間不明，但據《後漢書·南蠻傳》：「〔建初〕三年〔78〕冬，澧中蠻覃兒健等復反，攻燒零陽、作唐、孱陵界中。」<sup>70</sup> 則在蠻人起事之前，作唐縣已立。這樣一來，作唐縣也是在建武初五溪蠻人起事平息後三十年內設立。相對地，武陵郡也有兩縣遭到廢棄，分別是原為郡治義陵縣，以及無陽縣。無陽縣在無水流域，無水乃五溪之一。<sup>71</sup> 無陽縣之省併，更可推知東漢政府對於五溪地區掌控程度的降低。因此，從西漢至東漢武陵郡治的遷徙與境內縣治的轉變，學者認為此反映了東漢武陵郡開發的重點在郡境北部。<sup>72</sup> 東漢早期新舊縣的興廢與屯戍可參考文後的圖三「東漢早期武陵郡新舊縣的興廢與屯戍體系示意圖」。

建武二十三年至二十五年的這場蠻人與東漢政府的衝突雖未集中於澧水和澧水流域，但接下來的一個世紀，澧水和澧水流域的蠻人的確頻繁起事。此時，澧水流域的充縣，和澧水注入澧水處的零陽，就成為蠻亂與政府軍的爭奪之地。如「肅宗建初元年〔76〕，武陵澧中蠻陳從等反叛，入零陽蠻界。其冬，零陽蠻五里精夫為郡擊破從，從等皆降。」<sup>73</sup> 此次澧中蠻和零陽蠻皆反，但為郡兵擊敗。兩年後：

澧中蠻覃兒健等復反，攻燒零陽、作唐、孱陵界中。明年春，發荊州七郡及汝南、潁川弛刑徒吏士五千餘人，拒守零陽，募充中五里蠻精夫不叛者四千人，

<sup>69</sup> (晉)司馬彪，《續漢書》，志 22，〈郡國志四〉，收入《後漢書》，頁 3484。

<sup>70</sup> (南朝宋)范曄，《後漢書》，卷 86，〈南蠻西南夷列傳〉，頁 2832。

<sup>71</sup> (北魏)酈道元著，楊守敬、熊會貞疏，段熙仲點校，陳橋譯復校，《水經注疏》，卷 37，〈沅水〉，「無水出故且蘭，南流至無陽故縣，縣對無水，因以氏縣。」頁 3075。

<sup>72</sup> 李曉杰，《東漢政區地理》(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9)，頁 210-211。

<sup>73</sup> (南朝宋)范曄，《後漢書》，卷 86，〈南蠻西南夷列傳〉，頁 2832。

擊澧中賊。五年春，覃兒健等請降，不許。郡因進兵與戰於宏下，大破之，斬兒健首，餘皆棄營走還澧中，復遣乞降，乃受之。於是罷武陵屯兵，賞賜各有差。<sup>74</sup>

此次蠻人起事從建初三年（78）至五年（80），起事的有澧中蠻和澧中蠻。而東漢政府軍一開始是徵調「荊州七郡及汝南、潁川弛刑徒吏士五千餘人」，先是以零陽為基地。後又招募「充中五里蠻精夫不叛者四千人」反擊澧中蠻。這都說明了此次蠻人起事依然圍繞在充縣與零陽縣。又「和帝永元四年冬〔92〕，澧中、澧中蠻潭戎等反，燔燒郵亭，殺略吏民，郡兵擊破降之。」以及「安帝元初二年〔115〕，澧中蠻以郡縣徭稅失平，懷怨恨，遂結充中諸種二千餘人，攻城殺長吏。州郡募五里蠻六亭兵追擊破之，皆散降。……明年秋，澧中、澧中蠻四千人並為盜賊。」<sup>75</sup> 這三次蠻人起事依然發生在澧水和澧水流域，儘管沒有明確記載蠻人進攻縣城，但從殺害「吏民」與「長吏」看來，其對象應當是充縣與零陽縣之吏員。只不過永元四年（92）東漢政府是透過郡兵平息蠻人勢力，元初二年則是招募蠻人作為平定的手段。

澧水和澧水流域於東漢最後一次的大型蠻人起事，發生於順帝永和元年（136），史稱：「其冬澧中、澧中蠻果爭貢布非舊約，遂殺鄉吏，舉種反叛。明年春，蠻二萬人圍充城，八千人寇夷道。遣武陵太守李進討破之，斬首數百級，餘皆降服。」<sup>76</sup> 此次充縣縣城再度成為蠻人進攻目標，甚至跨郡界進攻南郡夷道，而東漢平亂軍則當是倚賴武陵的郡兵。

由以上諸次蠻人起事看來，澧水和澧水流域的蠻人通常選擇進攻下游的充縣和零陽，若順利，則會再沿澧水往下游進軍。東漢政府軍也都以此作為戰略的重要據點，甚至招募縣城週遭的善蠻一併加入平亂的陣營。因此，魏斌也認為這兩處縣治在治民教化外，也具有防禦澧中蠻和澧中蠻的軍事功能，其中當還存在著充縣—澧中蠻，零陽—澧中蠻的對應格局。且充縣在前，遭受到的威脅更大。即使上述澧中蠻覃兒健被平後，建初五年「罷武陵屯兵」，使得屯戍的軍力有所精簡，但此格局應該是一直延續。<sup>77</sup> 不過從上述地理書的記載看來，屯戍據點應該是沿著澧水流域展

<sup>74</sup>（南朝宋）范曄，《後漢書》，卷 86，〈南蠻西南夷列傳〉，頁 2832。

<sup>75</sup>（南朝宋）范曄，《後漢書》，卷 86，〈南蠻西南夷列傳〉，頁 2833。

<sup>76</sup>（南朝宋）范曄，《後漢書》，卷 86，〈南蠻西南夷列傳〉，頁 2833。

<sup>77</sup> 魏斌，〈古人提簡牘與東漢武陵蠻〉，頁 79-80。

開佈防，淩中蠻和澧中蠻既然有可能順著澧水而下威脅到下游的武陵、南郡郡治，因此在零陽更下游的馬援城也應負有防禦的任務。可以說，此屯戍體系包含了作為縣治的縣城，還有規模較小的軍事堡壘。

因為古人堤簡牘的出土，讓我們得知西元一世紀東漢政府在澧水流域建立起針對蠻人的屯戍體系。不過根據上述地理書的資料顯示，沅水流域也興築相當多的城池，暗示著沅水流域屯戍體系的成形。包括沅水中游的沅陵縣城一帶的劉尚城和平阿故城，沅水下游的臨沅和沅南兩縣城，以及週遭的司馬錯故城和日後被稱為武陵縣城的兩個軍事要塞。這都說明了沅水流域屯戍體系的前線在沅陵縣城，尤其在省併了無陽和義陵兩縣之後。下游則以郡治的臨沅和荊州刺史所在地的漢壽為核心區，週遭築以許多軍事要塞鞏固防禦。

這麼一來，伏波營等軍營也就不見得僅分布在澧水流域。五一廣場簡牘顯示軍糧是送往武陵臨沅，且接收單位是伏波營。因此儘管東漢中期以前，對抗政府的武陵蠻多集中在澧水流域，但屯戍體系中的各軍營應可能同時屯戍於澧水和沅水流域，甚至築有防禦性的小城。只是沅水流域尚無資料可佐證，未能知其詳情。

可以說，縣城以及週遭的許多軍事要塞一併構成了東漢政府應付武陵蠻人的屯戍體系。因為屯戍軍事要塞的性質單純，很容易吸引我們的眼光集中在這些軍事據點上。然而不可忽略的是，縣城除了民政的功能外，縣城城牆本身就具備濃厚的防禦功能。這些城池的規模大小雖然文獻缺載，但從這些城池後來的發展，則可看出東漢政府與蠻人之間關係的演變。

正如上述，許多縣城不是新建就是整修，這是在討論屯戍體系時不可忽略的。值得注意的是沅南縣城，原為馬援討伐蠻人時興建之軍事要塞，卻在隔年後迅速升格為縣治。除了從軍事角度思考外，此城足以運作，財政基礎當有許多編戶支撐，而其來源自然不會是當地的土著蠻人，更可能是留下駐紮的軍隊或是南遷的中原人士。在這種情況之下，沅南縣很可能就是個標準的移民社會，將軍事要塞升格為縣治，並打造成為更大規模的城池，也是保護這些安頓在沅水下游的新移民。雖然我們無法確知這些城池在東漢一朝防禦上運作的實際情況，但從留下來的城牆遺跡能夠遺留到後世，都表示各城牆仍具有一定的防禦能力。



即使如此，也未必每座城池皆是如此堅固。如自桓帝延熹五年（162）起，動盪已久的荊州南部盜賊與兵變勢力終延燒至零陵郡城，當時的零陵郡城牆防衛極弱：

而州兵朱蓋等反，與桂陽賊胡蘭數萬人轉攻零陵。零陵下溼，編木為城，不可守備，郡中惶恐。……〔陳球〕乃悉內吏人老弱，與共城守，弦大木為弓，羽矛為矢，引機發之，遠射千餘步，多所殺傷。賊復激流灌城，球輒於內因地執反決水淹賊。相拒十餘日，不能下。<sup>78</sup>

陳球（118-179）是面對民亂時，少數力守城池的太守之一。當時的零陵郡城牆就是「編木為城」，而非土牆，因不牢固，使得當時郡中吏民聽聞民亂時極度驚恐。可能因為事發緊急，無法補強城牆，而改以製造武器反擊敵人。雖說零陵郡城因為地勢低窪不易興建土牆，但以一郡治只有木牆，可以想見可能有其他許多縣城城牆恐怕也都未必非常牢固。又如周宏偉根據里耶盆地的考察，認為秦漢初的遷陵縣（今里耶古城）上游的大板村遺址，當為東漢遷陵縣治的所在地，其特色在於缺少城牆遺跡。換言之，在一連串的蠻人起事後，沅水上游的遷陵縣治雖仍能維持，但缺少城牆則可被視為實際接受東漢王朝實際統治時間不長所致。<sup>79</sup>但在澧水和沅水流域的其他諸城應該是繼續發揮作用，因為直到了三國以後，若干城池仍然是防禦武陵蠻的重要據點，後文還會提到。

那麼在這樣的屯戍體系下的政府與蠻人的關係又是如何呢？從這些郡縣城和屯戍要塞看來，東漢政府是透過軍事設施監控蠻人，並防禦蠻人的進攻。至於實際從事的人員，有上至外派的郡縣首長，以及從郡縣中選拔出的各級吏員，以及在此中擔當修繕工作和防禦任務的郡縣民。但一旦爆發衝突，其實地方政府還相當倚賴招募善蠻以面對與政府衝突的蠻人。

這些被稱為「善蠻」的蠻人，過去學界多從名稱進行探索，認為「善」指的是與政府關係較為良好的蠻人。但魏斌還從他們被稱為「五里蠻精夫」、「五里蠻」和「六亭兵」的稱號進行考察。魏斌認為「五里」和「六亭」表明了漢代的基層行政編制，說明這些蠻人是處在郡縣城和交通要道週遭，已經被編戶化的蠻民，但又同

<sup>78</sup>（南朝宋）范曄，《後漢書》，卷 56，〈陳球傳〉，頁 1831-1832。

<sup>79</sup> 周宏偉，〈湘西里耶盆地諸古城遺址的歷史身分〉，頁 249-251。

時受到君長的統治，故處於「郡縣與君長的雙軌體制」之下。也因為他們與官府的關係較於密切，故在面對與官府較為疏遠的蠻人反政府活動時，較容易以「蠻民」的身分協助政府平亂。此種蠻人內部的分化，也可以理解成為「熟蠻」與「生蠻」兩種相對的概念。<sup>80</sup> 不過配合前面討論古人堤簡牘 22 背面的人員名單資料看來，情況可能更加複雜。

漢代蠻人負擔的賦役制度是以「賁」為主，繳納賁錢或賁布，此可以折抵徭役。<sup>81</sup> 不過根據西漢初年張家山漢簡〈奏讞書〉案例，對於是否屯戍則蠻人與政府官方的認知卻是有落差的：

· 案曰：南郡尉發屯有令，變（蠻）夷律不曰勿令為屯，即遣之，不智（知）亡故，它如毋憂。· 詰毋憂，律：變（蠻）夷男子歲出賁錢，以當繇（徭）賦，非曰勿令為屯也，及雖不當為屯，案已遣，毋憂即屯卒，已去亡，何解？<sup>82</sup>

此案件中的主角蠻夷男子毋憂被要求擔任屯卒，但因自認已繳納「賁錢」而拒絕並逃亡，最終被追回且被判腰斬。然而從官方的說法看來，顯然對於「賁錢」所能折抵徭賦的範圍，在解釋上有強詞奪理之嫌。又根據上述提到東漢初年澧水流域的許多蠻人起事看來，其中的一個原因就是「貢布非舊約」。從這些事例可以得知，儘管漢朝政府與蠻人的賦役關係存在著不用服役的大原則，但不管是司法單位或是蒞民的行政官員卻單方面另作解釋，或改變制度，導致實際落實在蠻人的徭役負擔上的加重。正如前面提到在古人堤簡牘 22 背面的「毋朋」，或許就是已經編戶化後的蠻人，並脫離了君長的統治，故參加屯戍，只在姓氏上留下蠻人的痕跡。至於「五里蠻」等儘管在政治立場上偏向東漢政府，但是在衝突發生時才應募成為政府軍的一方，去對付反政府的蠻人活動。但在衝突結束之後，這些善蠻也因為仍處於君長的統治之下，且是透過招募的方式加入軍隊，並不會因為戰爭而改變原有的社會型態。

無論如何，位於澧水流域多樣的政府與蠻人的關係，包括了合作與衝突，都是處在漢朝政權極力推行編戶化，且背後有軍事屯戍支持下的結果。相對之下，東漢

<sup>80</sup> 魏斌，〈古人堤簡牘與東漢武陵蠻〉，頁 85-90。

<sup>81</sup> 可參考王萬雋，〈秦漢魏晉時代的「賁」〉，《早期中國史研究》，第 1 卷（2009），頁 123-153。

<sup>82</sup> 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編著，《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釋文修訂本）》（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頁 91。

初年的蠻人起事集中在澧、漵二水流域時，不但沅水中上游的蠻人極少呼應，起事活動也少，這都當與東漢政府將屯戍的重點移往沅水下游，並對沅水中上游控制力的縮減有關。

## 肆、孫吳的武陵蠻戰爭地理形勢

赤壁之戰結束後，因荊州成為各方角逐之所，荊州蠻人的力量再度浮上歷史的舞台。建安二十年（215），劉備（161-223）入蜀取代劉璋政權之後，與孫吳方面重新協議中分荊州：「分荊州，江夏、長沙、桂陽東屬，南郡、零陵、武陵西屬」。<sup>83</sup>故武陵郡在劉備政權的統治之下。然不久孫吳仍襲取劉備所擁有的荊州，殺害關羽（？-220），導致孫劉的聯盟關係破裂，走向對決。

關於劉備政權治理荊州時期與蠻人的關係，史料中僅有一條資料略顯其端倪。當孫吳軍在後方偷襲並攻下南郡江陵後，荊州多數將領都投降孫權方，但在武陵地區有官吏樊伉，聯合武陵蠻加以反擊：

武陵部從事樊伉誘導諸夷，圖以武陵屬劉備，外白差督督萬人往討之。權不聽，特召問〔潘〕濬，濬答：「以五千兵往，足可以擒伉。」權曰：「卿何以輕之？」濬曰：「伉是南陽舊姓，頗能弄脣吻，而實無辯論之才。臣所以知之者，伉昔嘗為州人設饌，比至日中，食不可得，而十餘自起，此亦侏儒觀一節之驗也。」權大笑而納其言，即遣濬將五千往，果斬平之。<sup>84</sup>

潘濬（？-239）為武陵漢壽人，曾擔任武陵郡功曹，或為郡之大姓。劉表（142-208）曾提拔潘濬為部江夏從事，後又被劉備延攬，輔佐關羽處理荊州事務。潘濬因曾與樊伉（生卒年不詳）共事，知其弱點，故樊伉雖聯合武陵蠻反孫權（182-252），但很快就被潘濬率軍所殺。

此段文字並未提及樊伉誘導的是武陵哪一地區的「蠻人」，但據《輿地紀勝》引

<sup>83</sup>（晉）陳壽，（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2011），卷 32，〈蜀書·先主傳〉，頁 883。

<sup>84</sup>（晉）陳壽，（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國志》，卷 61，〈吳書·潘濬傳〉裴松之注引《江表傳》，頁 1398。又《資治通鑑》將此繫於建安二十四年（219）吳軍進攻荊州江陵之時，見（宋）司馬光編著，（元）胡三省注，《資治通鑑》（北京：中華書局，1956），頁 2169。

《武陵記》云：「後漢梁松自義陵郡移居張若城，今州東張若城是也。太常潘濬征樊佺，平五溪還，以郡城大而難固，築障城，移郡居之。」<sup>85</sup> 由此可知，樊佺誘導的是五溪蠻。鑒於潘濬只率領五千人征討樊佺，並在捕殺樊佺後便告一段落，潘濬應未與五溪蠻存在過直接衝突。可能的情况是五溪蠻是配合樊佺行動，但樊佺死後，五溪蠻也無意繼續與孫吳軍對抗。不過在此過程中，潘濬應該是察覺到五溪蠻曾蠢蠢欲動，故回到臨沅城時，認為原臨沅城範圍過大不易防守，便在其中增加障城，即小城，並將郡機關遷移至小城之內，以增加防禦的強度。

劉備為報關羽之仇，於章武元年（221）發兵東向。時劉備已稱帝，除大軍由益州開拔外，亦聯合武陵蠻進行協同作戰：

秋七月，遂帥諸軍伐吳。孫權遣書請和，先主盛怒不許，吳將陸議、李異、劉阿等屯巫、秭歸；將軍吳班、馮習自巫攻破異等，軍次秭歸，武陵五谿蠻夷遣使請兵。……〔二年〕二月，先主自秭歸率諸將進軍，緣山截嶺，於夷道猓亭駐營，自佷山通武陵，遣侍中馬良安慰五谿蠻夷，咸相率響應。<sup>86</sup>

根據蜀漢方的說法，武陵五谿蠻主動提出合作，蜀漢才派侍中馬良前往共同協議，「遣良入武陵招納五溪蠻夷，蠻夷渠帥皆受印號，咸如意指。」<sup>87</sup> 由此可知，蜀漢試圖重新建立起與武陵五谿蠻的政治秩序。當時，馬良似乎相當深入沅水上游，《水經注》稱：「西北流逕義陵縣，王莽之建平縣也，治序溪。其城，劉備之秭歸。馬良出五溪，綏撫蠻夷，良率諸蠻所築也。」<sup>88</sup> 東漢初年曾經放棄的義陵縣，在東漢末年隨著吳蜀兩國的衝突，再度於此地興建。不過就當時的情況看來，頂多只是一個軍事要塞，在馬良的率領下，用以對付孫吳的勢力。

至於孫權方的行動則是一方面以陸遜（183-245）為首，率軍抵抗：

劉備帥軍來伐，至巫山、秭歸，使使誘導武陵蠻夷，假與印傳，許之封賞。於

<sup>85</sup> （宋）王象之撰，李先勇點校，《輿地紀勝》，卷 68，〈荊湖北路·常德府〉，頁 2319。

<sup>86</sup> （晉）陳壽，（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國志》，卷 32，〈蜀書·先主傳〉，頁 890-891。

<sup>87</sup> （晉）陳壽，（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國志》，卷 39，〈蜀書·馬良傳〉，頁 983。

<sup>88</sup> （北魏）酈道元著，楊守敬、熊會貞疏，段熙仲點校，陳橋譯復校，《水經注疏》，卷 37，〈沅水〉，頁 3077。

是諸縣及五谿民皆反為蜀。權以陸遜為督，督朱然、潘璋等以拒之。<sup>89</sup>

另一方面則是命由嶺南歸來的步騭直接從長沙支援：

權遣呂岱代〔步〕騭，騭將交州義士萬人出長沙。會劉備東下，武陵蠻夷蠢動，權遂命騭上益陽。備既敗績，而零、桂諸郡猶相驚擾，處處阻兵；騭周旋征討，皆平之。<sup>90</sup>

由此可看出，孫權方先是阻擋劉備方的進攻，進一步殲滅主力，之後才是步騭逐步平定與劉備相呼應的武陵蠻，以及掃平零陵、桂陽諸郡的動亂。

三國鼎立格局確立之後，蠻人的大規模起事以及孫吳政權的率兵征討還爆發過三次。第一次的時間不明，推測在三國鼎立之初，第二次發生在孫權稱帝的隔年，最後一次則是發生在蜀漢滅亡時。第一次武陵五谿蠻的起事記載在《三國志·黃蓋傳》中：

武陵蠻夷反亂，攻守城邑，乃以蓋領太守。時郡兵才五百人，自以不敵，因開城門，賊半入，乃擊之，斬首數百，餘皆奔走，盡歸邑落。誅討魁帥，附從者赦之。自春訖夏，寇亂盡平，諸幽邃巴、醴、由、誕邑侯君長，皆改操易節，奉禮請見，郡境遂清。<sup>91</sup>

這次事件未記載年月，不過據前後文推測當是發生在劉備大舉東侵之後，至孫權稱帝之前。<sup>92</sup> 透過戰爭的過程看來，整場戰爭屬於郡內戰爭，是郡治受到襲擊，身任太守的黃蓋（二世紀—210 年代）率兵反擊，並進一步征討蠻人。最終有許多蠻酋被擊殺，也有些蠻酋主動投降而被赦免，使其重新回到部落去。原有的蠻人君長、社會組織亦多存在，只是在政治上向孫權方投誠。因此，儘管起事在當年結束，但基本上孫權勢力並未實際進入蠻人部落內部。

雖然我們知道主要戰場發生在郡治，然而「巴、醴、由、誕」的意義與地理位置，學者則持有不同的看法。有學者認為就意義來說是地名或水名，可見於《三國

<sup>89</sup> （晉）陳壽，（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國志》，卷 47，〈吳書·吳主傳〉，頁 1122。

<sup>90</sup> （晉）陳壽，（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國志》，卷 58，〈吳書·步騭傳〉，頁 1237。

<sup>91</sup> （晉）陳壽，（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國志》，卷 55，〈吳書·黃蓋傳〉，頁 1285。

<sup>92</sup> 王素，〈漢末吳初長沙郡紀年〉，《吳簡研究》，第 1 輯（武漢：崇文書局，2004），頁 82-83。

志集解》，「潘眉云：『巴、醴當是巴陵、醴陵，由、誕未詳。』趙一清云：『巴、醴、由、誕，四水名，由即油水、誕即澧水也。』」<sup>93</sup> 也有學者認為是四個族名，如潘光旦認為巴為巴人，醴為俚人，由為瑤人、誕為蠻人。<sup>94</sup> 不過根據上下文，「巴、醴、由、誕」指的應為部落名，儘管部落名可能也與水名有關，然部落名未必指稱如潘光旦所指這四種人群的說法。就地理位置而言，從「巴」多分布於四川盆地東部；以及「誕」與「蠻」的關聯，位處四川盆地東部至三峽一帶，還有「醴」和「澧水」、「由」即「油水」的關連性看來，空間上是在湘西北，即位於澧水流域一帶及其週遭的說法較可信。<sup>95</sup>

曹魏明帝太和三年（227）四月，孫權於武昌稱帝，年號為黃龍，九月將首都由武昌遷往建業。但二年後卻再次爆發規模相當大的武陵蠻起事，當時孫權的作法是命令由嶺南北歸的呂岱（161-256）和中央的太常潘濬聯手討伐：「黃龍三年〔231〕，以南土清定，召岱還屯長沙漚口。〔一〕王隱交廣記曰：吳後復置廣州，以南陽滕脩為刺史。或語脩蝦鬚長一丈，脩不信，其人後故至東海，取蝦鬚長四丈四尺，封以示脩，脩乃服之。會武陵蠻夷蠢動，岱與太常潘濬共討定之。」<sup>96</sup> 呂岱與潘濬率軍至少五萬前往討伐，歷時二年多，終於在嘉禾三年（234）十一月平定。雖然武陵蠻起事的原因不明，但此次戰爭為時甚久，對武陵五谿蠻的打擊甚大，史稱：「五谿蠻夷叛亂盤結，權假濬節，督諸軍討之。斬首獲生，蓋以萬數，自是羣蠻衰弱，一方寧靜。」<sup>97</sup> 此次武陵蠻亂又稱「五谿蠻夷叛亂」，說明蠻人起事來自於五溪地區。尤其是五溪中的西水流域，《水經注》即稱：「西水又東逕沅陵縣北，又東南逕潘承明壘西，承明討五溪蠻，營軍所築也。其城跨山枕谷。」<sup>98</sup> 潘承明及潘濬，他在西水西北築軍事堡壘，為防禦蠻人，當可知至少蠻人有一股勢力是來自於西水流域。至於是否有來自其他地區的蠻人則因為記載較簡略，無法判斷。

<sup>93</sup> （晉）陳壽，（南朝宋）裴松之注，（清）盧弼，《三國志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2），卷55，〈吳書·黃蓋傳〉，頁1025。魏斌也認為水名的可能性較高，見魏斌，〈古人堤簡牘與東漢武陵蠻〉，頁81。

<sup>94</sup> 見潘光旦，〈湘西北的「土家」與古代的巴人〉，《潘光旦選集》，第2卷（北京：光明日報，1999），頁353。

<sup>95</sup> 潘光旦認為是分布在湘西北，見〈湘西北的「土家」與古代的巴人〉，頁353；魏斌則認為是在澧水流域，見〈古人堤簡牘與東漢武陵蠻〉，頁81。

<sup>96</sup> （晉）陳壽，（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國志》，卷60，〈吳書·呂岱傳〉，頁1385。

<sup>97</sup> （晉）陳壽，（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國志》，卷61，〈吳書·潘濬傳〉，頁1398。

<sup>98</sup> （北魏）酈道元著，楊守敬、熊會貞疏，段熙仲點校，陳橋驛復校，《水經注疏》，卷37，〈沅水〉，頁3083。

直到蜀國滅亡以前，武陵郡作為吳國的邊境相當平靜。然蜀國一亡，魏國積極地煽動吳國境內的武陵蠻，蠻人的騷動再次動搖吳國民心。對此，吳國則是派遣鍾離牧擔任武陵太守，務求穩定邊疆。針對武陵五溪蠻與魏國聯合的態勢，鍾離牧與屬吏曾討論應對作法。此事可論者甚多，茲徵引如下：

永安六年〔263〕，蜀并于魏，武陵五谿夷與蜀接界，時論懼其叛亂，乃以牧為平魏將軍，領武陵太守，往之郡。魏遣漢葭縣長郭純試守武陵太守，率涪陵民入蜀遷陵界，屯于赤沙，誘致諸夷邑君，或起應純，又進攻西陽縣，郡中震懼。牧問朝吏曰：「西蜀傾覆，邊境見侵，何以禦之？」皆對曰：「今二縣山險，諸夷阻兵，不可以軍驚擾，驚擾則諸夷盤結。宜以漸安，可遣恩信吏宣教慰勞。」牧曰：「不然。外境內侵，誑誘人民，當及其根柢未深而撲取之，此救火貴速之勢也。」敕外趣嚴，掾史沮議者便行軍法。撫夷將軍高尚說牧曰：「昔潘太常督兵五萬，然後以討五谿夷耳。是時劉氏連和，諸夷率化，今既無往日之援，而郭純已據遷陵，而明府以三千兵深入，尚未見其利也。」牧曰：「非常之事，何得循舊？」即率所領，晨夜進道，緣山險行，垂二千里，從塞上，斬惡民懷異心者魁帥百餘人及其支黨凡千餘級，純等散，五谿平。<sup>99</sup>

首先，魏國啟用原蜀漢的漢葭縣長郭純（生卒年不詳），並給予郭純試守武陵太守的名號，當是提高其地位得以煽動武陵蠻。漢葭縣為蜀漢涪陵郡之屬縣，涪陵郡是由原蜀漢的巴東屬國改置而來，當地蠻人眾多，這意味著郭純具有管理蠻人的經驗。其次，郭純進攻的方式是先率領人民進入遷陵縣界，不但煽動五溪蠻酋，還進一步進攻西陽縣。而遷陵、西陽兩縣皆位於五溪之一的西水流域，當可知郭純是由西水上游而來。至於吳國方面的因應作法，在鍾離牧以急行軍擊潰對手的意見以外，其他人的主張其實很值得分析。其一，多數吏員主張安撫的策略，說明儘管此次並未使用安撫策略，但安撫的做法應是針對五溪蠻常見的作法。其二，撫夷將軍高尚提到前述潘濬平定武陵蠻之所以成功，與「劉氏連和」有關。也就是吳、蜀兩國保有默契，在蜀國不援助五溪蠻的情況讓吳國無後顧之憂地派兵平定，甚至有可能蜀國幫忙安撫蠻人。但因為此次五溪蠻乃由魏國煽動，比起過往更加棘手。儘管鍾離牧對五溪蠻政治型態的認識與多數吏員相同，即當時反亂的五溪蠻並未「諸夷

<sup>99</sup>（晉）陳壽，（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國志》，卷60，〈吳書·鍾離牧傳〉，頁1394。

盤結」，只有部分酋帥響應魏國。但在做法上，鍾離牧不同意多數吏員認為吳國率軍攻打會造成蠻人酋帥之間的聯合，判斷蠻人之間的聯合並不穩固，反可以趁未結合之前給予痛擊。最終鍾離牧取採速戰速決之法，趁魏國與結盟之五溪蠻酋帥未站穩陣腳之前就加以殲滅。附帶一提，從最後被殺害的蠻酋百餘人和死亡人數千餘人看來，規模皆比潘濬率軍平時要小得多。

值得注意的是，史料中記載郭純進軍時進入的「遷陵縣」乃「蜀遷陵界」，而非吳國。對此，有學者即認為此次記載有誤，因自從孫吳從蜀漢方奪取荊州之後，屬於荊州武陵郡之遷陵縣當屬孫吳，而非蜀漢。<sup>100</sup> 不過從上述討論可知孫吳長年無法進入武陵郡控制當地蠻人，且武陵蠻在政治立場上多傾向蜀漢，那麼兩政權的控制範圍不完全按照原有行政區域規劃也是有可能的，孫吳應只是佔有武陵郡大部分，並非一定是記載有誤。況且，史書中有蜀漢築城於遷陵縣的記載。據《元和郡縣圖志》稱：「三亭縣，本漢遷陵縣，……酉水南有龍標故城，蜀將馬德信所築。其城甚寬大，在龍標山。」<sup>101</sup> 馬德信為蜀漢大將馬忠，曾任牂牁郡太守，與武陵郡相鄰，故將勢力推進到吳蜀邊境築城防禦相當有可能的。又周宏偉進一步根據考古發現認為，今里耶盆地酉水南岸保靖縣清水坪鎮里外城村很可能就是馬忠所築之遷陵縣所在地，甚至在當時行政規劃上屬於蜀漢的牂牁郡。<sup>102</sup>

鍾離牧在平定五溪蠻的起事後，曾調離他職，但之後又回任武陵太守，且卒於任上。在他任武陵太守期間，還發生另一起叛亂事件。此事不見於《三國志》，而是收錄於唐宋地方志。《元和郡縣圖志》稱：「車靈故城，在縣南一里。靈則吳之叛臣，入敘溪以自保，號車王，後為吳將鍾離殺之。」<sup>103</sup> 《輿地紀勝》稱：「車靈故城，在澁浦縣南一里。靈則吳之叛臣，入敘溪以自保。後為吳將鍾離牧殺之，見《元和郡縣志》云。」<sup>104</sup> 另《讀史方輿紀要》亦云：「縣南一里有車靈故城。靈，吳叛臣也，入澁溪以自保。吳將鍾離牧討殺之，城址尚存。」<sup>105</sup>

從上述的記載看來，此將領應為「車靈」，號「車王」。車王叛吳時間不詳，但

<sup>100</sup> 陳健梅，《孫吳政區地理研究》（長沙：岳麓書社，2008），頁181-182。

<sup>101</sup> （唐）李吉甫撰，賀次君點校，《元和郡縣圖志》，卷30，〈江南道六·溪州〉，頁752。

<sup>102</sup> 周宏偉，〈湘西里耶盆地諸古城遺址的歷史身分〉，頁251-253。

<sup>103</sup> （唐）李吉甫撰，賀次君點校，《元和郡縣圖志》，卷30，〈江南道六·辰州〉，頁748。

<sup>104</sup> （宋）王象之撰，李先勇點校，《輿地紀勝》，卷75，〈辰州〉，頁2650。

<sup>105</sup> （清）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北京：中華書局，2005），卷81，〈湖廣七〉，頁3825。



鍾離牧討伐當在平定五溪後。畢竟鍾離牧初任武陵太守，直接面對來自魏國入侵酉溪的壓力，應無暇南征敘溪。諸方志的記載雖未提及蠻人，但靈當與當地蠻人存在著密切關係。因敘溪流域自從東漢初年郡治由此地的義陵縣遷出後，政府控制力便衰退許多。上述漢末馬良欲連結五溪蠻，亦曾在敘溪率領蠻人築城以對抗孫吳，當可知當地正處蠻人勢力範圍。故車靈稱車王以及築車靈城，若無蠻人的幫忙，要自保以對抗孫吳，恐怕是很困難的。至於地方志中完全沒提到蠻人，推測可能是因為鍾離牧的討伐只是針對車靈，並未正面與蠻人交鋒，與當年潘濬對付樊伷類似。

儘管孫吳末年有鍾離牧在武陵郡的努力，但直到孫吳末年與西晉對峙時，卻還發生了五溪蠻依附西晉政權的情勢。史載晉武帝咸寧三年（277）：「是歲，西北雜虜及鮮卑、匈奴、五溪蠻夷、東夷三國前後十餘輩，各帥種人部落內附。」<sup>106</sup> 這說明了孫吳政權直到政權末年對於五溪蠻的控制力仍然不足。

## 伍、孫吳時期武陵郡的要塞興築與政區變化

在吳國與武陵蠻的軍事衝突之外，孫吳政權基本上承繼東漢時的沅水與澧水的屯戍體系而略有調整，以下分別論述之。

在沅水流域方面，潘濬經略武陵蠻時，曾築兩城，一城在臨沅縣城內，一城則在沅陵縣城外的酉溪流域上。臨沅縣城作為郡治，自然是防禦且也是核心區。相對於東漢在臨沅縣城外，形成眾多城池與堡壘的防禦型態，潘濬則主要加強臨沅縣城本身，增加小城，提升防禦的能力。此外，明確的時間不詳，但孫吳時期在沅水流域的更下游還新增一縣，由吳壽（原漢壽）劃分出一龍陽縣。<sup>107</sup> 因這不在臨沅縣城週遭，且更位於沅水下游，故此縣的設立最可能的理由應是基於戶口數的增長。由此可見，武陵郡的沅水下游仍是人群最聚集的地區。

至於沅水中游的沅陵縣城，是防禦五溪蠻的灘頭堡，東漢另築平阿故城、劉尚城等。但因東漢建初年間的蠻人起事主要來自於武溪，劉尚城的位置也是在「沅陵縣西南

<sup>106</sup>（唐）房玄齡等撰，《晉書》，卷3，〈武帝紀〉，頁68。

<sup>107</sup>（南朝梁）沈約，《宋書》，卷37，〈州郡三〉，「晉太康地理志、何志吳立。」頁1126。

一百二十里」。但是潘濬所築潘承明壘，則在沅水流域，「在今沅陵縣西北。」<sup>108</sup> 換言之，以沅陵縣城為中心，因應來自不同方向的蠻人，也就分別建築起不同的軍事堡壘。

不過孫吳政權與東漢政權類似的是，仍無恢復秦、西漢對於敘河流域的經營。雖曾有馬良所築義陵故城，與之後車靈所築車靈故城等，其規模大小不詳，可能皆屬要塞堡壘的規模，但其存在並非以防禦蠻人之用，而是外來者在當地蠻人的協助下抵禦孫吳政權之用。鍾離牧曾入敘溪擊殺車靈，可能曾墮毀車靈城。即使如此，直到晉宋時期，恢復了東漢曾在無水流域廢棄的無陽縣，<sup>109</sup>卻仍未恢復敘河流域的義陵縣。這些城池的分布，以及鍾離牧伐蠻抵禦西晉軍隊進攻的相關路線皆可參考文後圖四「孫吳屯戍體系與鍾離牧伐蠻路線示意圖」。

由上所知，即使潘濬「斬首獲生，蓋以萬數」，擄掠許多人口，破壞了蠻人的社會組織，孫吳在沅水流域的屯戍體系延襲東漢甚多，沒有本質性的變化。近年發現的吳簡之中，有所謂的「夷兵」、「夷民」和「生口」的記載。從中可知有蠻人被編入軍隊之中，如「夷新兵五十六人人二斛起嘉禾二年正月訖二月卅日其年四月十六日付柅師市」(3·2169)；<sup>110</sup> 也有蠻人被送往建業的記載，如「右尉陳貞(?) 使送夷民到建業」(5·總 3636))。另外，當時的生口被要求的自然是用於勞動，以下此簡就說明生口被送往屯田區從事屯田工作：

厶口人為生口送屯事對封府督郵

二月廿日謝兵曹史(1·1002)

當時長沙臨湘也存在許多生口買賣，如：「臨湘男子李烝買生口大男……屬兵曹」(7·1654)。這都是蠻人勢力在投降之後，被孫吳政府運用政治力重新安排，原有蠻人部落組織自然難以維持。但潘濬在此戰役之中只是短暫時間的進駐，

<sup>108</sup> (北魏)酈道元著，楊守敬、熊會貞疏，段熙仲點校，陳橋驛復校，《水經注疏》，卷 37，〈沅水〉，會貞按，頁 3083。

<sup>109</sup> (南朝梁)沈約，《宋書》，卷 37，〈郢州〉，「舞陽令，前漢作無陽，後漢無，晉太康地志有。」頁 1126。

<sup>110</sup> 已公佈之吳簡之釋文可參考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國文物研究所、北京大學歷史系走馬樓簡牘整理組，《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竹簡(壹)》，下冊、《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竹簡(貳)》，下冊、《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竹簡(參)》，下冊、《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竹簡(肆)》，下冊(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竹簡(伍)》，下冊(北京：文物出版社，2018)、《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竹簡(柒)》，下冊(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竹簡(捌)》，下冊(北京：文物出版社，2015)，以下只註明簡號，不再註明頁碼。

雖在一段時間內造成「自是羣蠻衰弱，一方寧靜。」但既然無法實際在蠻人活動的區域新設縣城，政府的力量也就無法根本性地改變蠻人活動地區的社會結構。

至於澧水流域方面，孫吳初年黃蓋與武陵蠻人的衝突中，從蠻人起事後黃蓋才上任武陵太守的情況來看，黃蓋當時應該是先前往至武陵郡治臨沅。但因黃蓋所帶的郡兵才五百人，面對來犯的蠻人，黃蓋是憑藉策略擊退蠻人的攻擊，並在蠻人撤回各自居地後，進一步追擊。因為蠻人可能來自於澧水流域，故蠻人起事後的「攻守城邑」，可能也曾以澧水流域的沅縣、零陽縣城為目標，如同東漢時期澧水、澧水蠻的起事類似。

值得注意的是，就文獻史料看來，從東漢以來，眾多將領處理武陵蠻人反政府的結果中，政府若能順利「平亂」，蠻人通常是「散降」或「乞降」，只有黃蓋能夠促使蠻人君長「皆改操易節，奉禮請見」。這差別在於此時的蠻人君長在一定程度上與孫吳政權達成政治上的協議，應是承認孫吳政權的羈縻統治。這對於孫吳政權對澧水、澧水流域的統治當有一定的幫助。不過這種羈縻統治關係，應該是自東漢政府與蠻酋之間便長期存在的。從目前所發現的許多官印之中，有許多屬於蠻夷君長的官印或私印，分布時代從漢到晉，且許多就是來自於澧水與沅水流域。<sup>111</sup>

因此，至孫休永安六年（263），孫吳分武陵郡北部為天門郡，且於澧水流域新置一澧中縣等政區變化，還可從不同方面思考。當年正值蜀亡於魏，天門郡新設立的因素當與外部的軍事壓力有關，且以零陽縣為郡治，形成新的屯戍體系。<sup>112</sup> 可以看出，在澧水流域與沅水流域類似，孫吳政權仍是承襲東漢的屯戍體系而略加改變。然在外部軍事壓力的考量之外，還必須考慮孫吳政權至此時不但加強了對於澧水、澧水流域的統治，也試圖深入澧水流域，澧中縣不僅具有防禦的功能，能夠維持縣廷的運作與當地蠻人被納入孫吳政權控制有關。就這點來說，比起沅水流域，孫吳政權在控制澧水、澧水流域的蠻人方面似乎有較大的進展。若僅由軍事方面思

<sup>111</sup> 如在慈利縣（漢晉時期的零陽縣）發現「沅蠻夷長」瓦鈕銅印，時代可能為西漢，參見陳松長，《湖南古代璽印》（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4），頁29、99。又據魏斌〈古人提簡牘與東漢武陵蠻〉一文轉述阿部幸信的觀點，推測為漢武帝以前諸侯國的自製之物，註87，頁81。另在桃源縣（漢晉臨沅縣）出土「晉蠻夷率善邑君」駝鈕銀印和「晉蠻夷率善邑長」駝鈕銅印。參見桃源縣文化館，〈桃源縣發現漢代銅器和晉代印章〉，《湖南考古輯刊》，第3輯（長沙：嶽麓書社，1986），頁276-277。

<sup>112</sup> 魏斌認為天門郡和澧中縣的設立主要從軍事方面考量，包括外部的軍事壓力，和對郡治零陽的鞏固有關。見魏斌，〈古人提簡牘與東漢武陵蠻〉，頁82。

考，也較難解釋西晉平吳之後，天門郡仍然存在的意義。只不過，孫吳政權晚年對於澧水流域蠻人的掌控也並非完全順利。因在西晉平吳不久後的太康四年（283），天門郡增設澧陽、臨澧二縣，並將郡治移至澧水下游的澧陽縣，魏斌也認為郡治移往下游，當與東漢武陵郡郡治移往下游的臨沅縣存在相似的情況，即受到來自蠻人方面的壓力。而這樣的變化，導致孫吳政權對澧水流域的新佈局僅維持二十年而已。<sup>113</sup>

就武陵郡來說，孫吳政權能分立天門郡是對境內蠻人控管的一大進展。但若從整體荊州的角度觀察，大約同一時間，荊州各地區都經歷了一個大量分立新郡的變化，且是由原各部都尉分立而來，時間橫跨孫亮至孫皓三位皇帝統治時期，然實際上集中於十年（257-266）之內。<sup>114</sup> 以下整理出孫吳中晚期荊州新郡設置的情況，其中包括並非以部都尉的形式轉變為郡者：

君主	時間	原政區名或地區	郡名	新置縣
孫亮	太平二年 (257)	長沙東部都尉	湘東郡	新平、梨陽、新寧
孫亮	太平二年 (257)	長沙西部都尉	衡陽郡	湘西、衡陽、新陽
孫休	永安三年 (260)	宜都西部所轄地	建平郡	興山、信陵、沙渠、建始
孫休	永安六年 (263)	武陵北部所轄地	天門郡	澧中
孫皓	甘露元年 (265)	零陵東南所轄地	營陽郡	舂陵
孫皓	甘露元年 (265)	零陵南部都尉	始安郡	平樂、尚安、永豐
孫皓	甘露元年 (265)	桂陽南部都尉	始興郡	始興
孫皓	寶鼎元年 (266)	零陵北部都尉	邵陵郡	高平、新城

【表一】孫吳政權中晚期荊州新郡建置表

資料來源：王萬雋彙整自陳健梅，《孫吳政區地理研究》，長沙：岳麓書社，2008。

<sup>113</sup> 魏斌，〈古人堤簡牘與東漢武陵蠻〉，頁 82-83。

<sup>114</sup> 其實不只是荊州，自東漢中期至三國時代，各地郡多有設部都尉之舉，尤其在漢末地方秩序紛亂的情況下，這些部都尉不但掌管軍事，也兼管轄下縣之行政，且日後多升格為郡。參見嚴耕望，《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甲部·秦漢地方行政制度史》（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7），第四版，第 3 章，〈郡尉〉，頁 175-187。

由表一可以看出，天門郡由武陵郡中分立在當時政區的變化中並不特別，是當時孫吳政權大量分立郡縣中的一環，且就置縣數量來說還是偏少的。故透過比較其他荊州諸郡，武陵郡在孫吳統治時期還是明確以防禦的態勢呈現，進一步的掌控較少。但即使如此，孫吳分武陵郡為天門郡的這一步轉變，仍然深刻地改變了歷朝之後對於湘西統治的格局。


此外，孫吳政權歷次的討蠻戰爭中，已見不到東漢時期所謂的「善蠻」。雖然孫吳的軍隊之中有「夷兵」與「夷民」，仍可見到以蠻攻蠻的方式，不過當中的內涵卻有差異。如上所述，東漢時代的善蠻是處於郡縣與部落的雙軌體制之下，是以應募的方式協助政府軍對抗其他蠻人的反政府活動，或許其中可能有些強制性，但還存在著蠻人的主動性。蠻人於戰後仍各歸原部落與編戶的管理，參與戰爭並不會造成身份的轉變。但是孫吳政權中的蠻人通常是來自於戰俘，所謂對山越「彊者為兵，羸者補戶」的作法，同樣適用於蠻人。因此，由於他們已經失去部落組織庇護，被當成戰利品編入國家或將領的軍隊；加上他們身分位階低，讓強制性的出征更顯非自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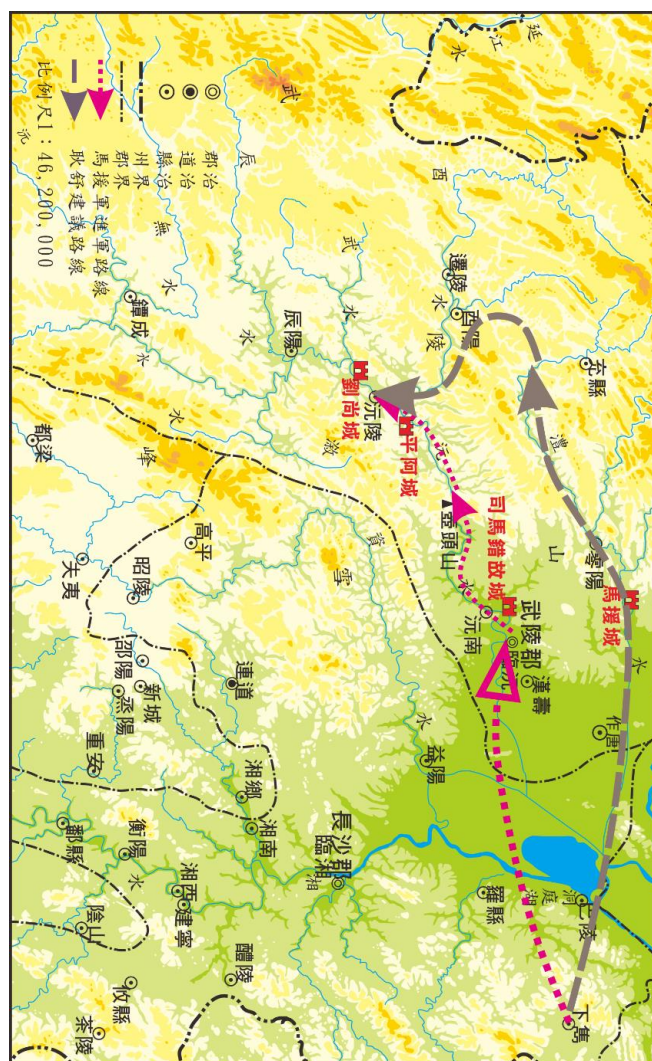
## 陸、結論

東漢光武帝建武二十三至二十五年的武陵蠻反政府活動，是東漢時期一連串動亂的先聲，並對東漢政府治理武陵郡產生了巨大的影響。這場戰爭的主要戰場在沅水中下游，主角是武溪蠻，東漢政府多次派遣軍隊征伐都無法掃蕩成功，不但死傷慘重，最後只能在和談中結束。至於在這場戰役之中，有些學者主張充縣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本文認為其最多應只是配角，是在戰後才成為東漢政府控禦蠻人的重心之一。在這場長期征戰的過程中與戰役之後，東漢政府為了對抗反政府的武溪蠻，曾新建許多城池或修繕許多軍事堡壘，以加強防禦的強度，在空間上主要沿著沅水流域與澧水流域展開。沅水流域方面，以中游的沅陵，下游的臨沅最為重要，且臨沅還在戰後成為武陵郡郡治，週遭的軍事要塞甚多。至於澧水流域方面，則以零陽和充縣最為重要。須強調的是，儘管東漢中期武陵蠻的反政府活動集中在澧水流域，但不能只重視澧水流域，而忽視沅水流域中下游的屯戍體系。伴隨著東漢兩大流域屯戍體系的形成，也說明了東漢政府放棄自秦至西漢以來對沅水中上游的經營。

透過東漢古人堤與五一廣場簡牘的資料，更可獲知建武年間東漢政府設立的軍營，如伏波營至少被保留至二世紀初。且透過若干人數的記載，軍糧的數字進行推估，這些屯戍的軍力並不少。但是軍隊當中的軍事人員，也從中央朝廷派出由武陵郡外的兵士組成，轉變成為武陵郡內郡縣民的日常力役負擔。此外，應付蠻人反政府的活動，還常招募與政府關係較緊密的善蠻，皆說明東漢政府在組織防禦以及平蠻軍隊成員上的轉變。

東漢末年至孫吳時期，武陵郡正處於吳蜀交界地帶，蠻人還涉入兩政權的衝突之中。相對於東漢武陵蠻反政府活動集中在澧水流域，孫吳時期武陵蠻則集中在五溪地區。孫吳政權曾在潘濬的率領下一度給予蠻人沉重的打擊，許多蠻人甚至成為戰俘，被強制編入軍中參與戰爭。但孫吳政權依然無法深入沅水上游，基本上仍繼續延續東漢以來在沅水與澧水流域的屯戍體系；不同的是，在澧水流域新設天門郡，可視為孫吳政權加強了澧水流域的統治。而將沅水與澧水流域在行政區劃上分治的做法，也影響了日後各王朝對於湘西地區蠻人的統治格局。

無可否認的是，儘管本文透過考察新的簡牘資料，並與地理書進行交叉比對，得以了解更多關於東漢三國時代武陵地方政府與當地蠻人的關係。然而本文能夠掌握的也只偏向從空間地理上屯戍的分布；至於更詳細的兵士人員數量與兵士如何配置等問題，都很難得到更為具體的歷史圖像。本文的課題，或許還賴之後有更多資料的出土整理，得以再繼續推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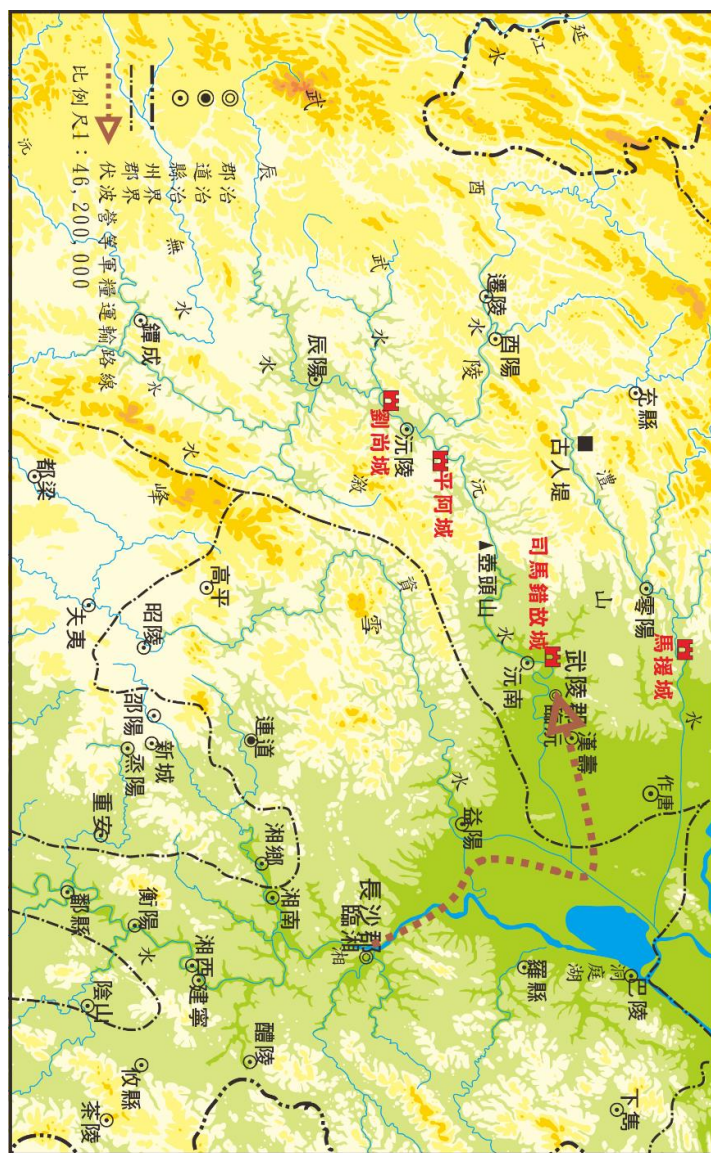


【圖一】東漢馬援伐蠻路線與屯戍體系示意圖

圖片來源：王萬雋製作，始於臺大歷史中國中古近世史領域發展計畫（2008-2010 年），後因此文需求增修本圖片。

資料來源：（南朝宋）范曄，《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81）；（宋）王象之撰，李先勇點校，《輿地紀勝》（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5）；（北魏）酈道元著，楊守敬、熊會貞疏，段熙仲點校，陳橋譯復校，《水經注疏》（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1989）；（唐）李吉甫撰，賀次君點校，《元和郡縣圖志》（北京：中華書局，2005）；（晉）崔豹，《古今注》，收錄於《諸子集成 補編（十）》（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據四部叢刊三編景宋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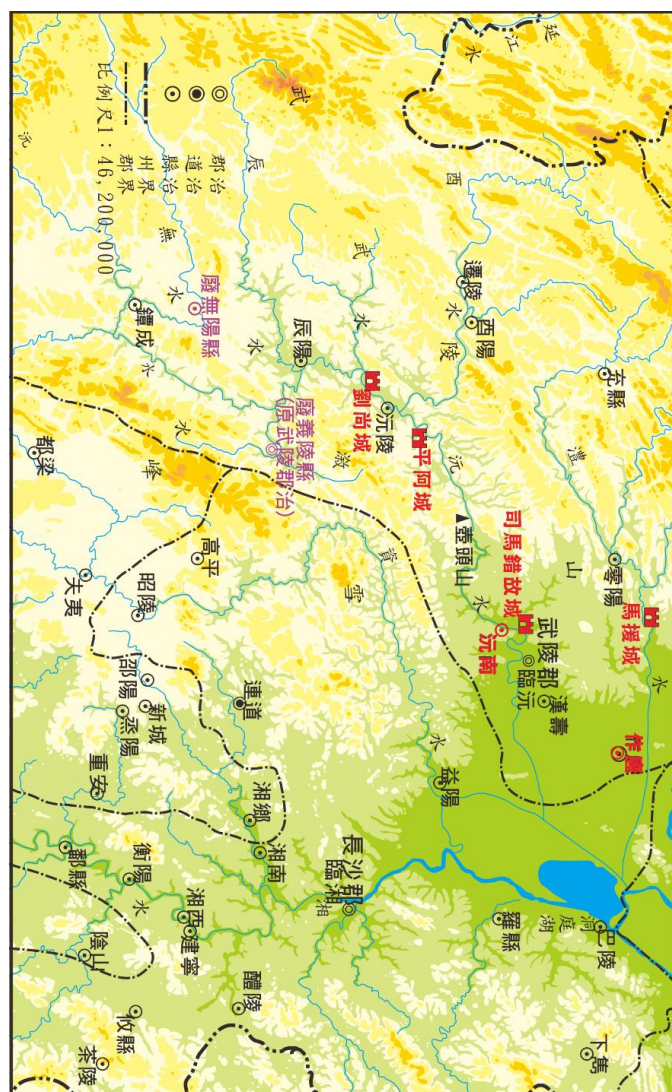


【圖二】東漢古人堤與伏波營的軍糧運送路線示意圖

圖片來源：王萬雋製作，始於臺大歷史中國中古近世史領域發展計畫（2008-2010 年），後因此文需求增修本圖片。

資料來源：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國文物研究所，〈湖南張家界古人堤簡牘釋文與簡注〉，《中國歷史文物》，第 1 期（2003）；魏斌，〈古人堤簡牘與東漢武陵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85 本第 1 分（2014）；劉樂賢，〈長沙五一廣場出土東漢王皮木牘考述〉，《中山大學學報》，第 3 期（20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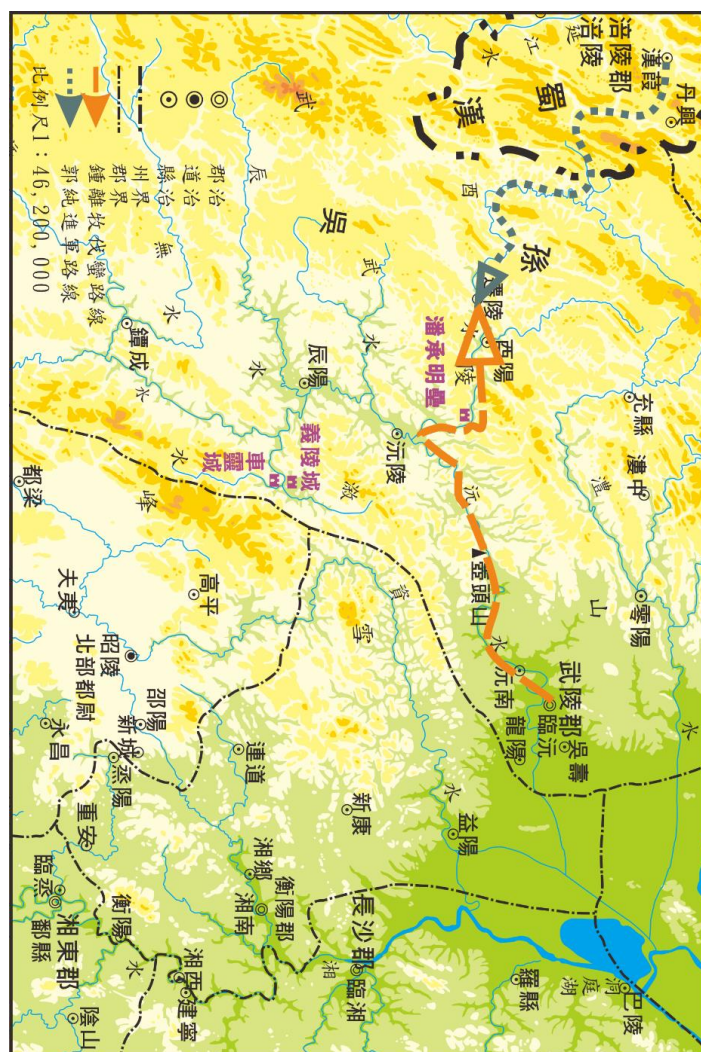




【圖三】東漢早期武陵郡新舊縣的興廢與屯戍體系示意圖

圖片來源：王萬雋製作，始於臺大歷史中國中古近世史領域發展計畫（2008-2010 年），後因此文需求增修本圖片。

資料來源：（南朝宋）范曄，《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81）；（宋）王象之撰，李先勇點校，《輿地紀勝》（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5）；（唐）董伋，〈修陽山廟碑〉，收入（清）董誥，《全唐文》（北京：中華書局，1983）；（北魏）酈道元著，楊守敬、熊會貞疏，段熙仲點校，陳橋譯復校，《水經注疏》（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1989）。



【圖四】孫吳屯戍體系與鍾離牧伐蠻路線示意圖

圖片來源：王萬雋製作，始於臺大歷史中國中古近世史領域發展計畫（2008-2010 年），後因此文需求增修本圖片。

資料來源：（晉）陳壽，（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2011）；（南朝梁）沈約，《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北魏）酈道元著，楊守敬、熊會貞疏，段熙仲點校，陳橋譯復校，《水經注疏》（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1989）；（唐）李吉甫撰，賀次君點校，《元和郡縣圖志》（北京：中華書局，2005）；周宏偉，〈湘西里耶盆地諸古城遺址的歷史身分〉，《古代西南地理問題新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8）。

## 徵引書目

### 一、古籍

- (晉)陳壽，(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2011。  
(晉)崔豹，《古今注》，收錄於《諸子集成 補編(十)》，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據四部叢刊三編景宋本。  
(南朝宋)范曄，《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81。  
(南朝梁)沈約，《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  
(北魏)酈道元著，楊守敬、熊會貞疏，段熙仲點校，陳橋譯復校，《水經注疏》，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1989。  
(唐)李吉甫撰，賀次君點校，《元和郡縣圖志》，北京：中華書局，2005。  
(宋)樂史撰，王文楚等點校，《太平寰宇記》，北京：中華書局，2007。  
(宋)王象之撰，李先勇點校，《輿地紀勝》，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5。  
(清)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北京：中華書局，2005。  
(清)盧弼，《三國志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2。  
(清)董誥，《全唐文》，北京：中華書局，1983。

### 二、專書

#### (一) 中文

- 王素，《漢唐歷史與出土文獻》，北京：故宮出版社，2011。  
田繼周，《秦漢民族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  
伍新福，《湖南民族關係史》，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  
李曉杰，《東漢政區地理》，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9。  
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國文物研究所、北京大學歷史系走馬樓簡牘整理組，《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竹簡(壹)》，下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  
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國文物研究所、北京大學歷史系走馬樓簡牘整理組，《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竹簡(貳)》，下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  
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國文物研究所、北京大學歷史系走馬樓簡牘整理組，《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竹簡(參)》，下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  
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國文物研究所、北京大學歷史系走馬樓簡牘整理組，《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竹簡(肆)》，下冊，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  
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國文物研究所、北京大學歷史系走馬樓簡牘整理組，《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竹簡(柒)》，下冊，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  
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國文物研究所、北京大學歷史系走馬樓簡牘整理組，《長

沙走馬樓三國吳簡·竹簡（捌）》，下冊，北京：文物出版社，2015。

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編，《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牘選釋》，上海：中西書局，2015。

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編著，《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釋文修訂本）》，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

陳松長，《湖南古代璽印》，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4。

陳健梅，《孫吳政區地理研究》，長沙：岳麓書社，2008。

黃今言，《秦漢軍制史論》，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

嚴耕望，《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甲部·秦漢地方行政制度史》，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7，四版。

### 三、期刊論文

#### （一）中文

于豪亮，〈居延漢簡中的「省卒」〉，《文物》，第11期（1963），頁44-46。

王瑞蓮，〈試論武陵、五溪的區別及五溪蠻的分布〉，《中南民族學院學報》，第5期（1989），頁44-47。

王萬雋，〈秦漢魏晉時代的「賁」〉，《早期中國史研究》，第1卷（2009），頁123-153。

王萬雋，〈漢末三國長沙族群關係與大姓研究之一——漢末部分〉，《早期中國史研究》，第2卷第1期（2010），頁43-86。

李均明、宋少華，中國文物研究所編，〈《長沙走馬樓吳簡》竹簡〔肆〕內容解析八則〉，《出土文獻研究》，第8輯（2007），頁182-195。

李鄂權、駱黃海，〈從長沙走馬樓吳簡看孫吳時期長沙郡的人口流動和民族融合〉，《福建文博》，第4期（2003），頁35-41。

沈剛，〈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所見「生口」買賣問題補論〉，《煙台大學學報》，第29卷第2期（2016），頁89-93。

凌文超，〈走馬樓吳簡中所見的生口買賣——兼談魏晉封建論之奴客相混〉，《史學集刊》，第4期（2014），頁73-81。

桃源縣文化館，〈桃源縣發現漢代銅器和晉代印章〉，《湖南考古輯刊》，第3輯（1986），頁276-277。

張雄，〈漢魏以來「武陵五溪蠻」的活動地域及民族成分考述〉，《中南民族學院學報》，第1期（1985），頁25-34。

涼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館、昭覺縣文館所，〈四川涼山州昭覺縣好谷鄉發現的東漢石表〉，《四川文物》，第5期（2007），頁82-89。

-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國文物研究所，〈湖南張家界古人堤簡牘釋文與簡注〉，《中國歷史文物》，第1期（2003），頁72-84。
- 熊曲，〈也說吳簡夷民問題〉，《簡帛研究》，春夏卷（2015），頁229-236。
- 熊曲，〈論長沙走馬樓吳簡中「生口」及相關問題〉，收入中國文化遺產研究所編，《出土文獻研究》，第12輯（2013），頁327-339。
- 劉國忠，〈五一廣場東漢簡王皮運送軍糧案續論〉，《出土文獻》，第7輯（2015），頁250-253。
- 劉國忠，〈長沙東漢簡所見王皮案件發微〉，《齊魯學刊》，第4期（2013），頁41-43。
- 劉樂賢，〈長沙五一廣場出土東漢王皮木牘考述〉，《中山大學學報》，第3期（2015）年，頁52-61。
- 瞿湘周，〈劉尚馬援五溪征蠻之地小考〉，《中南民族學院學報》，第5期（1988），頁47-48。
- 魏斌，〈古人堤簡牘與東漢武陵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1分第85本（2014），頁61-103。
- 魏斌，〈吳簡釋姓——早期長沙編戶與族群問題〉，《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24期（2008），頁23-45。
- 羅新，〈王化與山險——中古早期南方諸蠻歷史命運之概觀〉，《歷史研究》，第2期（2009），頁16-20。
- 羅新，〈吳簡中的「督軍糧都尉」簡〉，《歷史研究》，第4期（2001），頁168-170。
- 羅維慶、羅中，〈馬革裹屍何處還——馬援征武陵蠻歿地新考〉，《中央民族大學學報》，第3期（2010），頁80-86。

## （二）日文

- 滿田剛，〈長沙走馬樓吏民田家莧に見える姓について〉，《嘉禾吏民田家莧研究——長沙吳簡研究報告》，第1集（2001），頁80-95。

## 四、專書論文

### （一）中文

- 于振波，〈走馬樓吳簡習語考釋〉，收入氏著，《走馬樓吳簡初探》，臺北：文津出版社，2004，頁228-233。
- 王素，〈說「夷民」——讀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笥記〉，《故宮博物院院刊》，第5期，北京：故宮博物院，2004，頁49-52。
- 王素，北京吳簡研討班編，〈漢末吳初長沙郡紀年〉，《吳簡研究》，第1輯，武漢：崇文書局，2004，頁40-86。

周宏偉，〈湘西里耶盆地諸古城遺址的歷史身分〉，收入氏著，《古代西南地理問題新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8，頁242-256。

周宏偉，〈「五谿」本義考〉，收入氏著，《古代西南地理問題新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8，頁257-269。

侯旭東，長沙市簡牘博物館、北京吳簡研討班編，〈吳簡所見「折咸米」補釋——兼論倉米的轉運與吏的職務行為過失補償〉，《吳簡研究》，第2輯，武漢：崇文書局，2006，頁176-191。

潘光旦，潘乃谷等選編，〈湘西北的「土家」與古代的巴人〉，《潘光旦選集》，第2卷，北京：光明日報，1999，頁309-480。

羅新，長沙市簡牘博物館、北京吳簡研討班編，〈也說吳平斛〉，《吳簡研究》，第2輯，武漢：崇文書局，2006，頁192-200。

## （二）日文

谷口房男，〈三国時代の武陵蠻〉，收入氏著，《華南民族史研究》，東京：綠蔭書房，1997，頁33-55。

谷口房男，〈後漢時代の武陵蠻〉，收入氏著，《華南民族史研究》，東京：綠蔭書房，1997，頁11-31。

## 五、學位論文

高震寰，〈從勞動力運用角度看秦漢刑徒管理制度的發展〉，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研究所博士論文，2017。

（責任編輯：曾郁蘭）